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黄如论			
副 理 事 长	林 峰	徐启源	高 翔	
理 事	张苏飞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邹自振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张苏飞	林 山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武夏红			

《闽都文化》总第 42 期 2016 年第 1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张苏飞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邹自振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章进取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康 芬	何财铭	
装帧设计	杨 雪		
封面摄影	王华南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子邮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也说乡愁

左海风流

- 6 夏 雪 与近当代中国共命运的严复和严复的后人们
- 14 孙汉生 甲午之泪凝成《严复全集》
- 16 孟丰敏 时光倒流几道巷

闽都译才

- 21 于 丹 青史有痕风有声
——罗丰禄与科技翻译
- 28 陈 三 女翻译家薛绍徽的贤媛人生
- 35 高 倓 等人 我们的父亲高名凯
- 42 林本椿 闽都多译才

闽都记忆

- 47 唐 希 优雅人生淡如菊
- 52 李海涛 “一六事件”和刘卢之战

在线读城

- 58 邱泰斌 福州金鱼与传人们
- 67 黄 淦 榕城的鸟与爱鸟人

P6



与近当代中国共命运的严复和严复的后人们

P21

青史有痕风有声
——罗丰禄与科技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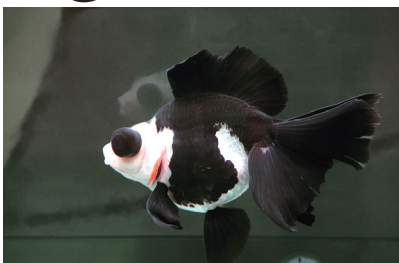
Contents

P47



优雅人生淡如菊

P58



福州金鱼与传人们

P82

坚守与创新

——陈朱书法艺术管窥



世味流年

- 4 林 飞 也说乡愁
- 72 禾 源 家脉
- 76 陈曼远 苦乐年华话蓑衣
- 79 陈巧珠 檀木盒里的光阴

艺术档案

- 82 赵玉林 坚守与创新
——陈朱书法艺术管窥
- 84 陈 朱 陈朱书法作品

双塔视野

- 86 王宜春 龚易图与“大通楼”藏书
- 90 沉 洲 大宋天空下的并蒂莲

古文今读

- 95 陈诸安 从《陈晋之读书法》说陈昉
- 封二 陈 朱 陈朱书法作品
- 封三 史迎光 锦上添花

也说乡愁

林 飞

诗人余光中说，乡愁是小小的邮票、是窄窄的船票、是矮矮的坟墓、是浅浅的海峡。诗人席慕容说，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大树，永不老去。作家梁鸿说，乡愁是对农业文明的念想，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方式。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说，乡愁是你生活的环境所赋予你的感情。这个生活环境是依靠历史建筑和山水相依形成的一个物质形态。而“人”在这个环境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个环境中，人与人形成一种和睦相亲的关系。

我说乡愁，是旅居在外的游子对家乡的眷恋。它寄托于远山、近水；寄托于街坊、巷弄；寄托于古厝、老树。福州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曾任苏州、镇江知府的王仁堪曾写过一幅对联“多留余地铺明月，不筑高墙碍远山”。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

波”。山与水是乡愁的前提。已经 80 多岁的台湾退役上将叶昌桐是福州人，他去年回福州一定要去烟台山的石厝教堂看看，因为他的父亲，一位留学法国的军医，曾在那里誓师北伐。曾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陈冲家在福州朱紫坊，他记得他家门上的对联“门前老树不知岁，河上长流无尽时”是他爷爷写的。

我说乡愁，是年龄稍长对青春年少时生活场景和校园的美好记忆。棋圣吴清源虽然出生 9 个月就离开福州，对故乡没有多少记忆，但他 1988 年回福州时还是探访了他的出生地——北大路半野轩。我在仓山长大，烟台山、烟台山泳池、仓山影院、跑马场和闽江边的海关埕，是我小时候向往的地方。仓山小学门口的大台阶、古榕树，附中的校园及灯光球场，是我们同学微信群中说不尽的话题，构成了我们的共同记忆。

我说乡愁，是对家乡特色美食的向往。有人说，年夜饭吃的是乡愁。有人说，家乡美食是看得见的乡愁。我听过一位企业家讲的故事，当年他侨居印尼，想见侨领林绍良，多次要求未果，后来他煮了一桶福清酸笋，在林绍良先生办公楼楼下走来走去，不一会儿林先生闻到酸笋味道，就召见了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老乡，助他成就了一番事业。1985年，我陪同美籍华人、国际工程界泰斗级人物林同炎先生由福州去厦门，林先生祖籍福清，路过福清时他不顾70多岁的高龄，一定要下车买几块福清饼啃啃。2010年5月，福建省省长去拜访福州乡亲辜振甫夫人严倬云女士，

带去的正是福州的燕皮和橄榄。

乡愁至真、向善、唯美，是与爱情一样永恒的人类情感。乡愁物化于名城、名镇、名村，物化于街坊、老树、古厝之中，大拆大建以及之后的千城一面是文化缺失，是在毁掉乡愁。乡愁是沧桑的，学者余秋雨说“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若对历史街区和古厝进行改头换面、焕然一新的所谓整治，即是在糟践乡愁。



与近当代中国共命运的严复和严复的后人们

夏 雪



严复

“夏雪，你知道作为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吗？”问这句话的是台湾艺人凌峰，时间大

概是 1990 年，那时凌峰正在大陆制作电视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是台湾第一部介绍中国大陆风土民情的电视纪录片。而我，当时正在采访他。

说实在的，凌峰的问题让我的脑袋一时出现了空白。“最值得骄傲的？”我的大脑如搜索引擎般快搜，却无法定格。大概是见我沉吟，或者更是不想难为我，凌峰一改艺人的玩世不恭相，说道：“福州的三坊七巷出了很多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人物，像严复，像林纾，还有陈宝琛、萨镇冰、沈葆楨。”“林纾，一个完全不懂英语的人，翻译了世界名著《茶花女》；我最敬佩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让我们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一

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现在的长度最短，100多米，但据说当年它的长度列七巷之首。郎官巷其实是严复晚年的住处，他的家乡是福州郊区盖山镇阳岐村。严复从小入私塾读古文，13岁那年，父亲染病去世，家境变得困难，只好中断了学优致仕的道路。1866年，像当时许多贫家子弟一样，严复报考了福州船政学堂，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经过5年的学习，1871年严复又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1877年，严复与方伯谦、萨镇冰等船政学堂毕业生一起去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1880年，从英国回来不到一年，严复即被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招至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其教学能力得到李鸿章“造诣精进”的评价。但由于没有科举的正途出身，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迟迟得不到升迁，思想主张难以实施。

1897年，一部注定要影响几代中国人思想发展的文化巨著——《天演论》破茧而出。一经发表，便迅速在维新人物中间流传，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弥漫着严复《天演论》的思想。《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平常的3年，甲午海战惨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天演论》的出现，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

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侏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天演论》之后，严复又马不停蹄地翻译了另外7本西方著作。这些书令严复声名鹊起。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但几个月后，因为身体的原因，严复即辞去了北大校长一职。

1920年，严复回到了福州。他想在晚年时候落叶归根，于是选择了福州，入住郎官巷。当时严复已经60多岁了，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只能靠实为鸦片的“特效药”减轻病痛。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8岁。在确知自己将不久于世时，严复留下了遗言，其



严侨



严倬云

中包括为未来出世的孙女起名“倬云”。

“倬云”取自先秦《诗·大雅·云汉》一诗中“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这首诗记载了周宣王仰天求雨的祷词，目的是要体现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诚，有恤民之仁”。

弥留之际的几道先生，是否祈望子子孙孙，勇于探索，能如阳光穿越浩瀚的银河，让思想穿越中外古今呢？

二

严倬云为严复的三公子严叔夏和台湾板桥林家林尔康的二女儿之女，上有哥哥严侨，下有妹妹严倬云，即台湾女作家华严。

关于福州三坊七巷严家和台湾板桥林家、辜家等的婚姻，若展开就是中国近代望族的一部

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画卷。简单地说，大概是：居住在三坊七巷，时为末代帝师的陈宝琛赴台公务，与台湾板桥林家大家长林维源一见如故，当下决定两家联姻，陈宝琛做主将妹妹陈芷芳嫁给了林维源的弟弟林本源的儿子林尔康。林尔康和陈芷芳育有三子二女：林熊征、林熊祥、林熊光和林慕安、林慕兰。

林尔康和陈芷芳的大女儿林慕安嫁给了林则徐外孙、清船政大臣兼办台湾海防事务沈葆楨的儿子沈林策；二女儿林慕兰则由陈宝琛保媒嫁给了严复的三公子严叔夏。长子林熊征娶了盛宣怀（晚清尚书，慈禧所赐钓鱼岛岛主）的五女盛关颐，育有女儿林倩，林倩后来成为严侨的妻子；次子林熊祥则娶了陈宝琛四女陈瑜贞，他们的儿子即现在台湾文献委员会主委林衡道，他曾为家族纪念亭题对联曰：“淡江水连闽江水，龟山云接

鼓山云”。

厦门鼓浪屿的“菽庄花园”（也叫林家花园）和福州杨桥巷的“林家大院”见证了那一段历史。

1946年，严倬云的大舅林熊征在台湾去世，同时，二舅林熊祥与辜振甫等人涉嫌“共同阴谋窃据国土”被捕，他们兄妹随母亲林慕云赴台奔丧、探亲，并留在了台湾。未一同前行的严叔夏则留在了福州，继续福建协和大学的教书生涯。新中国成立后，严叔夏历任协和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长、福州市副市长。同时他还是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市政协委员。后在福建教育学院任职。1962年9月病逝，年65岁。也就是说，自1946年严叔夏与妻女分离后，从此天人两隔。

倬云说，他们家的孩子都是在外婆家长大的，陈太傅家的家规严格，是从宫里学来的。“妈妈小时候早上要向外婆请安，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等人来请，晚上也要请安后才能去睡觉。我小时候也是受的这样的教育，觉得要长幼有序，不能没有礼貌。”在她的印象里，外婆很慈善，很爱自己的乡亲，冬施棉袄夏施暑汤。她很为外婆骄傲，因为外婆很爱国，一生都做中国人。

林熊祥被释放后，极力向妹妹林慕兰力荐难友辜振甫，25岁的倬云却不想嫁给他，因为担心两人受的教育不同。但算命先生说“这个人是天替你选的，嫁给他福气无穷”，而且，“一把阳伞遮尽天”，能帮助很多很多的人。于是倬云在舅舅

的陪同下跟辜振甫见了面。一见面，就觉得他文质彬彬。辜振甫别出心裁带她去打高尔夫球、看画展、听交响乐，终于赢得美人芳心，约会8个月婚姻就定了下来。新婚夜，辜振甫作诗一首：

“并肩携手举金觥，此夕联欢天玉成；信誓百年双宿鸟，彤楼华烛照三更。”

婚后差不多十几年，倬云与辜振甫一共养育了5个孩子。她待在家里，照看孩子，伺候婆婆。有时带着孩子出去玩玩，有时跟朋友见见面。因为不会打麻将，她唯一的娱乐，是在辜振



1948年11月8日严倬云与辜振甫结婚



停云（中）和倚云（左）、倬云（右）合影



严停云摄于郎官巷

甫得空的时候，等孩子睡了，一起出去看电影。极少的出行中，辜严倬云与蒋宋美龄互动密切。辜振甫“商而优则政”，从台湾工商协进会会长，到“总统府”国策顾问与资政，到后来的海基会会长。这里面还有辜严倬云的热心公益与广结善缘。辜氏夫妇长年深受蒋介石及宋美龄的关爱。在孩子们陆续长大后，辜严倬云走出深闺，1992年被宋美龄任命为台湾妇联会总干事。宋美龄在世时，她是宋美龄最得力的助手，与宋美龄情同姐妹。当宋美龄希望将妇联会交到她的手上时，她要求宋美龄允诺，妇联会的核心价值是妇女的公益团体，必须完全远离政治。宋美龄离台前夕，她还要求宋美龄签“不干预政治”的条子，宋美龄不但不生气，还开心地签了字。

回忆那一段历史，有一件事情倬云记忆深

刻。她说：辜振甫有一个穷画家朋友开画展，他带我去看，我看见他悄悄地包了一个红包，趁人不在，把他那个朋友叫到旁边，把那一包的钱塞给了他。这温情、细腻的一幕，触动了一旁佳人心底最柔软的一隅。记忆深刻的，还有辜振甫求婚时用英语唱的那首英文歌《当我们年轻时》，那是好莱坞经典音乐片《翠堤春晓》的主题曲：当我们正年轻，五月风光令人迷醉，你对我说你爱我，当我们年轻时……

正如歌中所言，半个世纪来，他们彼此扶持，鹣鲽情深，谱出人人称羡的家国情缘。

三

严停云到台湾的时间较母亲和姐姐迟些。

1949年，她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已经谋得了留校当助教的职位，原想趁暑假之机将母亲接回上海。但她到台湾不久，当地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母亲林慕兰就劝她留在了台湾。

在姐姐严倬云与辜振甫交往的同时，她与叶明勋相恋并于1949年缔结良缘。叶明勋为福建浦城人，是“中央通讯社”第一位台湾特派员，为台湾新闻界大佬级人物。他毕生从事新闻传播与教育工作，又关心国是与社会公益，以诚恳诚实为处事原则，与当政者保持“清清爽爽”的关系，说实话，做正事，不恃不求，因此能名重朝野，获得普遍敬重，被台湾新闻界尊为“明公”。

叶明勋秉性温和，幽默风趣，能饮善谈，轻利害而重然诺，人缘极佳。也正因此，当辜振甫想从香港回到台湾发展时（应严倬云的外叔祖、板桥林家的林柏寿之邀，1949年底辜振甫带着新婚太太到香港，一住3年，3年中长女、次女相继出生，其间辜振甫曾以笔名发表小说），叶明勋代向当局试探辜振甫返台安全与否，终获蒋介石批准，辜振甫才得以返台。辜返台未久，叶明勋又力荐辜振甫负责台泥、台纸等四家公司民营化事宜。辜答应8个月内完成，后来他提前完成，自此获台湾当局的肯定，并以台泥为据点，展开纵横政界的生涯。

和姐姐一样，婚后，停云也专心在家，成为家庭主妇。她与叶明勋育有三女一子。长女叶文心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儿子叶文立曾任联太国际公司总经

理、联广公司总经理、和信国际传播公司总经理、凯络媒体服务公司董事长，是安吉斯媒体(Aegis Media)集团大中华地区董事长。

严停云的创作是在生完4个孩子，忙完家庭琐事，再关起门来完成的。第一本作品《智能的灯》花了3年才完成。笔名取自佛学经典《华严经》。受祖父与父母亲笃信佛教的影响，她的作品常常呈现佛家的智能与慈悲精神。她说，人的一辈子，需要静下心来面对一切。小说写好后，叶明勋拿给《大华晚报》的耿修业，一连连载了120天。在报纸上连载时，胡适正在住院，每天都看，但不知道是停云写的。他后来写信告诉停云，这本书刚出版时，他向出版社预订了5本。1962年，他将其中一本送给了李敖，内页有胡先生题字：“小说一本请姚从吾先生转李敖。”

停云从此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她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现代中国的历史和50年代后台湾的社会变迁，以及在变迁中人的心灵激烈的内在冲突。她擅长描写人的七情六欲及生老病死，忠实呈现人生的不完美，也提供智慧的心语。她先后撰写了《生命的乐章》《神仙眷属》《不是冤家》《兄和弟》《出墙红杏》等20多部作品，其中多部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主演有秦汉、萧蔷、马景涛、焦恩俊等人，深受观众欢迎。她还为自己的连续剧唱歌，《七色桥》中的《渔歌》《花落花开》中的《燕子》以及《燕双飞》中的《红豆词》，都是由她演唱的。

停云可谓是台湾文坛的常青树，从1958年

开始，至今耄耋的她，仍笔耕不辍。2006年6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台湾著名女作家华严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三地的作家学者荟萃羊城，停云也回来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回大陆，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出门了，而且为的是那一片天空，那一片土地，我一直深深怀念那一片天空。为了这份感情，我一定要回去的……

四

“22年前，也就是1993年的4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在新加坡会面，签订了4个协议，为两岸制度化协商打下了基础。”2015年11月7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此前，在全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下，海峡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双手紧握。这一穿越66年时空的伸手相握，不仅连接起了两岸的过去，更紧紧地握住了两岸的未来，握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

的确，与辜振甫的企业惊人成就而较，促成“九二共识”“汪辜会谈”，才是辜振甫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最辉煌的业绩，也是他在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会长任上的巅峰之作。正是因为有了“九二共识”和“汪辜会谈”，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对话才奠定了基础。

“九二共识”是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大陆的海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在香港进行商谈，

就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最终达成了“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海协会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

“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后举行的首次会谈。在汪、辜签字之时，他们的背后站着两位女士，就是汪道涵夫人孙维聪与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

“两岸人民交流，一定得往好处想，先想对方好的，这样谈才有意义，不然很容易谈到死胡同去。”辜严倬云女士说。

当电视、报纸、广播、网络各种媒介铺天盖地地传播习马会现场这一重大新闻时，汪道涵夫妇和辜振甫均已仙逝。辜严倬云女士谈及22年前的那场会谈，对一些生活细节的记忆依然栩栩如生，而对那些庄严的政治谈判则讳莫如深，她表示政治是男人的事情，太太们绝不参与政治。

“他们去会谈，我们两个夫人绝对不能跟他们坐在一起。我们两个夫人去旅行，就带着一个小小姐，安全人员。在北京就去看故宫啊，在新加坡就去看新加坡的鸟啊、艺术品啊，绝对不能参与政治问题。”辜严倬云女士说，“汪道涵先生是个好人。他还是我的校友。他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然后念交大。我是在福州读进德小学，然后也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念书。南洋模范中学

分男校和女校，汪道涵先生念男校，我念女校。汪道涵先生的太太也是念南洋模范中学。”

夫人们自然也有夫人们的话题，比如妇女的工作，比如慈善公益。对于好的事情，不仅是对自己好的事，而且是对两岸都好的事，辜严倬云女士都记得很牢。甚至是一些小细节，比如22年前宴会的菜谱，“情同手足”“龙族一脉”“琵琶琴瑟”“喜庆团圆”“万寿无疆”“三元及第”“兄弟友谊”“燕语华堂”“前程似锦”等等，辜严

倬云女士依然如数家珍。她感慨先生和他们的太早“过去”。“他们开启了两岸的和平交流。我一直同意两岸和平相处。我们同是炎黄子孙，什么缘故要做敌人？我不懂。做敌人的人，都是要做大官，要争权夺利的人。真正爱自己老百姓的人，爱自己人民的人，都是我爱你，你爱我，我也不想抢你的东西，你也不想抢我的东西。”已是鲐背之年的她，用最最质朴的语言，表达了政治家们深思熟虑所要表达的内容。



位于福州郎官巷的严复故居

甲午之泪凝成《严复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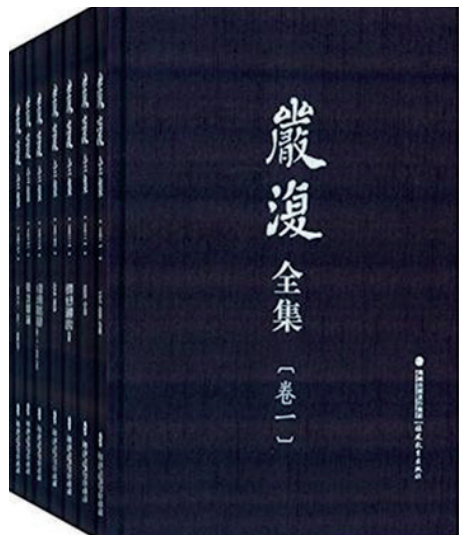
孙汉生

青年时代的严复，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常常议论纵横。但是，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已经42岁了，严复尚无文章和译著问世。

严复13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1877年赴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留学，1879年归国，回到母校任教习，不到一年，就被李鸿章招致麾下，参与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后升任总办（校长），满怀海军救国强国之梦。甲午战争北洋水

师全军覆没，马尾船政学堂和英国留学同学以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很多壮烈殉国，海军梦轰然坍塌，严复常中夜起而大哭，锥心泣血。严复长子严璩云：甲午战争中国大败，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之《天演论》，未数月而脱稿；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严复由海军总教头一变而为启蒙思想家，一腔救国志，几把辛酸泪，凝成一部部传世之作。





《严复全集》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严复惨痛反思。经过 30 年洋务经营，清朝海军已有一定实力，军舰装备号称亚洲第一，可是日本以寥寥数舰，区区数万兵力，一战剪我藩属，再战陪都动摇，三战夺我最坚海口，四战威海之军覆没。甲午之败，非一朝一夕之故，政治上，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人民皆奴隶，自然没有主人翁精神，与民主国家相战斗，无异于驱奴隶以斗贵人，固何往而不败？道德上人心浇薄自私，军队将领腐败，私卖军火，贪污军饷，临阵互不接应，各顾其私。顽疾尚在学问上，民智低下，不足自存于物竞之际；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于是提出一系列石破天惊的思想主张：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虽然在 1895 年至 1898 年间大声疾呼维

新变法，但是并没有投身于变法政治活动之中，而是一边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一边埋头译述西学著作。最有影响的号称“严译八大译著”：或引进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社会学理论，警醒国人在列强蚕食鲸吞的世界自强争存；或告诫人民恪守自由的边界，合群保种；或借以培植国人的科学思维，改善国人知识结构。

振聋发聩的呐喊之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接踵而至，可是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中国并未富强，社会反而陷入了漫无边际的分裂和混乱。每次变革发生，严复都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对变法和革命中的过激思想和行为作深刻反思，但政客们各自忙着占山为王割据自雄，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严复反赢得小楼保守名。

严复晚年哀叹，及吾之世，太平富强固属不可复见。长孙出生时，焚香拜祖而有诗曰：“震旦方陆沉，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但严复对中华文明和自己的思想仍然充满自信，对国家民族的未来仍然寄予坚定信念，满怀希望。自拟书房联语曰：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临终遗言告诫子孙：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

时光轮回两度，又逢甲午。福建教育出版社将迄今所发现的严复佚文搜罗殆尽，纂成《严复全集》。全书 11 卷，包含严复的译著、文录、诗词、信札、日记、批注等。译著部分收入八大译著和其他译著，仅《天演论》就选取了 6 种不同版本。

时光倒流几道巷

孟丰敏

仓山区阳岐村几道巷外，两棵榕树盘虬卧龙在一条河的深处，浓荫努力撑开成伞，与河道旁民宅里尽情伸出臂膀来接应它的树丫，在凋零的秋意里，竟拥揽成一片隐秘的翡翠庄园。小村的古老溪流阳岐浦蜿蜒而行，静静地淌出小村，向外借一条路到达乌龙江。阳岐浦历史上是福州西郊的水路交通要道，溪流的出口直接注入乌龙江（闽江下游一段），为永泰县到福州必经之处，为闽侯县以南方向到福州必经之处。唐至北宋，福州向南的主驿道从这里经过。而阳岐村位于福州南台岛西南部的乌龙江边，曾是福州城郊的码头港口重镇，也是进出福州市区的一条交通要道。这个古老的村落引起人们注意的重要原因

是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里程碑式的伟人。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

从福州市区出发，上南三环，至湾边立交桥，桥下有个转入阳岐村的巨大指示牌，在指示牌前方有段斜坡公路上去即是严复的祖居地阳岐村，即今日仓山区盖山镇上岐村、下岐村所在。严复曾作诗《梦想阳岐山》：“门前一泓水，潮至势迟迟。”此泓水必是阳岐浦。《严几道年谱》言及阳岐：“溪山寒碧，树石幽秀，外临大江，中贯大小二溪，左右则有玉屏山、李家山楞严诸丘壑。”可见阳岐村风景之优美。站在几道巷外的河



阳岐午桥

旁，刚好涨潮时分，潮水把小村衬托起来，仿佛一叶秋色轻浮在云端。假如时光倒流一百年，那时潮涨，卧龙般的榕树、河对岸的玉屏山庄倒映在江河里，道旁满院落花随风卷，是怎样一番美景呢，最是惊艳人间无限好吧。

“世事了如春梦过，夜潮还与故乡通。”在严复的《和寄朝鲜金泽荣》诗里，故乡、明月、河流都是一场春梦般的事，遥远得恍如隔世，却令他魂牵梦绕。因为他长期居住在津京两地，

自然怀念故乡。严复9岁到11岁期间在祖居地阳岐村几道巷的“大夫第”跟随五叔父严厚甫秀才学习。14岁父亲病故后，他又随母亲回到祖居大夫第生活。这诗里的故乡、家园，自然是这阳岐村和大夫第。祖居地的童年时光对严复来说一定是一生最难忘的，何况阳岐村人文历史底蕴深厚，值得玩味的地方太多了。

以水运为交通要道时代，阳岐在福州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宋代就十分繁荣，保留了不少古渡口，还密布各种保佑水上航运、人行水上平安的庙宇，如尚书祖庙、忠肃祠，临水娘娘陈靖姑的毓麟宫、凤鸣寺、观音阁、北极玄帝庙、薛太师祖庙等。还有严复晚年住过的玉屏山庄、严复主持重修的尚书祖庙、严氏宗祠。如今保留下的严复活动过的重要古建筑是今人全面了解严复的重要渠道。

阳岐以一条溪水为界，分为上岐与下岐，横贯阳岐浦上的一座建于宋元祐四年（1089），青石板铺就的小桥东西走向，名“午桥”，东头一棵古榕遮天蔽地。据说，桥栏上的“午桥古迹”系北宋蔡襄所书。

过了午桥，寻几道巷到严复祖居“大夫第”。阳岐古村在严复先祖从河南中原迁居到此时，是一座繁华小镇，距离福州城区虽有距离却保留着乡绅的气派。所以，即使今日阳岐村呈现一副衰老风霜面貌，却无法使人错漏那些曾经华丽的深深庭院。它们有的与严复祖居毗邻，有的隔岸相望。当地村民说附近某户高氏府邸、陈家

大宅曾经风光不可一世，还有午桥旁耸立的一栋欧式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楼未知具体来历，也由此可见一斑。

严复始祖严怀英曾官居朝议大夫，故严复祖屋常年悬挂一块“大夫第”的匾额。“大夫第”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曾于明代翻修过，依然保持原有的砖木结构。房屋两进，前面有一个天井，后面是一座庭院。门外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阳岐严复故居”。严复当年随五叔就读时，私塾就设在“大夫第”前座，严复就住在后座西边的一间披榭中。福州老建筑古屋中经常出现披榭这样的建筑名称。榭是我国古代一种很美的建筑形式，凭借周围风景而构成，形式灵活多变。其实这披榭却是祖屋墙外的破旧木屋而已，而非水上亭榭楼台。可见严复回到祖居的生活是相当艰难的，而且那时也已成婚生子。

严复孙女严停云在其著作《吾祖严复的一生》中写道：他绝不愿意因自己缘故把已住在那儿的族亲赶出去。这便安于那两间小木屋，靠母亲和妻子为人绣花、缝纫所得的微薄收入过日。常常早上出门没吃什么东西，经过卖“鲭仔”（家乡特产，生腌的一种小鱼，其咸无比）的小担子，给贩者一个小钱，两个手指头拈起两三尾小鱼仰面往嘴里一丢，一面咀嚼着一面昂首阔步地走着

去。祖父成名后，那介于祖居和破屋之间的小弄道被称为“几道巷”；至于他住过的那两间小屋，则因年久失修倒塌而被拆除了。“几道”福州方言即“石阶”，音译成普通话就变成了“几道”，一说这是严复自称“几道先生”的由来。此几道巷原有阶梯通往后山的严氏宗祠的，如今已夷为平地了，但仍与严氏宗祠道路相通。

严复 13 岁离开阳岐村，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沈葆楨创办的福州船政求是堂艺局，与阳岐村一别就是 50 年，但一直梦中萦回阳岐村，所以晚年曾回到阳岐下岐李坨山中的玉屏山庄居住过一段时间。山庄属同村清末邳州知州叶大庄所有，有 20 多间房屋，村河环护山庄，景色怡人。叶大庄去世后，玉屏山庄被分割出卖。严复购了其中一座单进住宅，作为他的晚年住房和三



阳岐严复故居

儿子严叔夏结婚的洞房。玉屏山庄至今整体保存完好，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难得的中西合璧住宅。严叔夏曾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去玉屏山庄参观严叔夏婚房，也是当地村民津津乐道的趣事。

严复后来写诗回忆在阳岐的生活：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
家贫有质券，贖钱不充债。
陟冈则无足，同谷歌有妹。
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
上捲先人骸，下养儿女大。
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
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
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

100多年过去了，严复留给我们的是一道遥

远而光辉的历史背影。漫步阳岐村，看看那人世变迁后的古旧模样，孩童从午桥嬉笑走过，仿佛看到了少年的严复及其少年时代苦难生活的历史背景。正因为少年时期的艰难困苦，使他能在简陋破屋中发奋图强，思想早熟而深沉，内心对国家民族的繁荣复兴产生了强烈的家国责任感，日后才能发展出复杂却超前的思想轨迹。也是这样的乡间生活，培养了他一种闲适从容的性情，而致力学问、精益求精，成为一代大学者、大思想家。

清宣统二年(1910)，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伯玉选址监造，墓园建在阳岐村上岐的鳌头山，即现在南三环路北与新建福湾工业园之间，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严复自书墓碑“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及“惟适之安”横



严复墓

屏。民国十年（1921）严复病逝后葬于此。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曰：“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文章光气长垂虹。”

严复在世时为自己的身后作了如此安排，说明他对祖居、故园深情难忘，怀着落叶归根的传统理念，而且依然是和原配夫人葬在一起。我由市阳岐严复纪念馆的馆长严孝鹏带路，来到了位于鳌头山的严复墓园。关于鳌头山，严复在《怀阳岐》诗中如此描写：“鳌头山好浮佳气，崎角风微簇野航。”说明严复挑选此地作为安生地，是认为此处风水极佳。当然，严复在世时鳌头山是离福州城区非常偏远的一座山丘。古代为军事信号台，因山顶有巨型怪石如海龟而得名。墓园四周风景因时代变迁而变化较大，如今墓园外是311汽车公交总站，方便游客直接坐车直达这里。

严复墓园造型像鳌头的额，面朝东南方向，

与盖山隔江相对的是闽江出海口五虎山。墓园为风字形，土石结构，五层墓埕，占地面积1680平方米，环以围墙。墓前石墙设有两个铁门。进入墓园，拾阶而上，第三层墓埕中立一石条横屏，阴刻“惟适之安”四个楷体大字。石头横屏后及拱顶墓前立着青石墓碑，碑面楷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大翻译家，严复留在墓碑上的便仅有这样一行文字。一个丰功伟绩者至死仍如此谦卑，可见其胸怀正如林则徐的名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著作思想才能被永久地镌刻在历史的不朽丰碑上。严复的光辉思想在历史上空闪耀如星，使得古老的阳岐村依然像那绵绵不绝的阳岐溪流时而安静，时而奔涌，从此不再被世人和光阴遗忘。



严复题写的“尚书祖庙”

青史有痕风有声

——罗丰禄与科技翻译

于丹

—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终于同意采纳林则徐等有识之士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于是，在历史的云幕上镌刻出洋务运动时间表：1865年11月江南制造局在上海成立专门制造军舰和枪支；1866年6月，史称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马尾船政学堂成立。从1866年到1905年，船政局制造出兵商轮船40艘，使得我国的海洋运输和作战能力一跃进入世界前列。然而，最辉煌的成果却是人才培育。一时间，船政学堂出身的思想家、政治家、翻译家、工程师群星璀璨，铸成中国近代史上绕不过的群峰。

翻译家罗丰禄就是其间一座伟岸的山，一颗闪亮的星。凭借博大胸怀和爱国热忱，他加入



马尾船政学堂旧景

经世致用和科技救国的行列，以翻译家和职业外交家身份为民族鞠躬尽瘁。虽然他“将著书而未就”错过了文人以笔留名的人生，但他将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效忠民族。这是命运使然，也是时代精英报国的选择。

在回顾罗丰禄翻译家身份时，须补充一个公众忽视的史实。

上海黄浦江畔，有一条高昌庙路，路旁有一座简朴的木质两层楼。这便是中国首家国家级翻译馆旧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翻译家的圣地——木房简陋，却是现代无数科技名词诞生的庄严产房。

1867年9月，两江总督李鸿章给朝廷奏折上申请成立翻译馆的理由是“正名办物，以绝洋人覬覦”，“盖翻译乃制造之根本”。而一向被视为老顽固的慈禧太后在这事上却毫不犹豫地批示：准奏。

我们，两个世纪后的参观者，可在实地体验中华工业化的发端，竟来源于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细节——科技知识的普及和情报的传授。无他，“可能”将变身“不可能”。

面临西方列强炮火轰门，晚清的洋务派官员和精英们毅然决然摒弃重科举轻科技的传统，将西方科技引进中国，体现了救国的务实，从而掀

开了近代史浓重壮丽的一页。这史实还从反面启迪了后来的革命者：我们不能对帝国主义亦步亦趋，不然，“老师总是要打学生”。

“制夷”始自“师夷”，师夷始自翻译。学习外国技术，要先把机械图纸和书本翻译成母语。正如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顾彬指出：为何欧洲的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英国是从何时开始发达的？答案是：从翻译开始。这是世界文明史发展一再证实的真实。

梁启超也高呼：“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笔以译书为强国第一要义。”用黑格尔的话说则是：一件新东西“要到能用自己的国语表达时，它才能成为我们的所有物”。因此，科技术语和文献的翻译便是洋务派的第一要务。

但是，不同于文学翻译，科技翻译是一群寂寂

无名的盗火者，墨史不留芳——这是许多文化中不可理解的惯例。众多译者虽是博学之士，却寒窗耕耘无出头之日，虽责任重大，却青史无名，



罗丰禄在伦敦使馆

不像文学翻译出名有日可待。所以时至今日，这职业从未被列入热门一栏。相反，公众眼中的翻译形象，只见台前光艳鲜丽，谁知一盏黄灯寒窗孤影的辛劳？

江南制造局制造军品，马尾造船厂制造炮舰，均是国家综合工业能力体现——与矿山、冶炼、机械制造和电机等行业瓜连蔓牵，并涉及广泛的科学基础知识学科：数学、化学、物理等——这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正名取名之意：“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史料表明：中国当代科技信息的源头 80% 来自当时的翻译——上海制造局和马尾船厂。工作流程走西译中述式，即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笔录加润色。定名原则为：有中文名则沿用，若无则创立新名。译名汇编成《中西名目字汇》。通过翻译，许多科技名词沿用至今，如几何微积分等，又如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钾钠锰镁等 64 种化学元素的名称。

作为船政学院首期毕业生，罗丰禄以大考第一名和五门外语能力而留校做教习。但是他的职责要远超过今天的教师。

首先，船政学院课本全以法文或英文引进，师生必须手抄翻译定名后，才作为学习资料。其次，造船机械小自一个螺母大到车床，从安装到使用全靠外教口授，中教笔译定名。罗丰禄的工作量用钻山寨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最后，船政学院基础课设置堪比肩现代任何一所理工学院：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热力

学、机械学等；高年级生则要学习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应用力学、球面三角、航海天文等。而授课语言却是法语或英语。因此，年轻教师罗丰禄的首要工作便是课堂翻译兼讲课。如此跨学科口译的高强度和工作压力，不但史无前例，而且也是后无来者，因为今天，像所有其他学科一样，翻译的分工也日趋精细。因此，有综合能力的多面手翻译也逐渐稀有。

二

科技文献翻译要求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严谨对接，故译员须储备极宽的知识面。更何况新技术当道，必定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新名词诞生。用母语“定名”便是行业标准的树立，往往关系到一国新产业的发展，绝对马虎不得。

比如，美国的“矿体储量模块”软件能大大减少钻井探测的昂贵成本，而首次引进时，计算机在国内尚是稀罕物件，英语资料看起来更像天书。几经曲折，部领导才找到一位留美海归并调来配合翻译。

数月加班，总算可以提交国家计委的技术审评。翻译台前除了担任首席口译的本人，还有两位高级工程师。3 小时会议结束，我们三人由于高度紧张和持续专注，右手痉挛到筷子都握不住。可见在新技术翻译定名中，人的心力憔悴和劳神苦心。

现代科技翻译实践中，翻译员一定要和技术

人员共同协作。经常，某专业术语须反复斟酌数次方能定稿。这就是当年流传下来的科技翻译的好传统。

江西省东北部的婺源，以中国最美村庄闻名遐迩。可鲜有人知晓，在离此地 100 多公里的西南部有亚洲最大的铜生产基地——贵溪铜业，年产阴极铜 80 万吨，其中德兴露采矿山为世界第三大斑岩铜矿。所用的设备和技术世界领先，露采现场的挖掘机和装载机都是巨无霸。如一个铲斗上可站立 42 个人，而电动轮卡车的轮胎直径超 3 米。它们绝不可在普通公路上行驶，因此所有的安装调试使用培训均在现场实施。

为此，整整一代人献出了宝贵青春，包括各语种的翻译。

曾经山谷春风，奇花异草人面笑靥；曾经千峰雪漫，风头如刀手难握笔，但无一人临阵退却。记得冬夜飘雪，有位长沙籍的白发高工，细细切出人参根须，卷在烟丝内，他抽烟，让我们闻香提神，熬过漫漫冬夜。今日回想，那与战士坚守战壕毫无二致。

译者能甘守着孤独和执着，因为这是报效祖国和民族的方式。

20 世纪 70 年代建设武钢和宝钢时，翻译资料以吨计，要用卡车运。最鼎盛期，武钢翻译楼曾聚集过 2000 多名译员。楼内的灯火 24 小时通明。

黄河之水天上来，历史长河舟楫奋进，从不沉寂。150 年前在流放西域途中，林公则徐曾留

诗：“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身为后辈翻译，前辈翻译家罗丰禄所走过的冰炭之途，犹如祁连山般壁立千仞高山仰止。

前有榜样，翻译薪火定能代代相传，为着一个共同梦想——中华复兴。

三

科技上的正名如此艰辛，外交上的正名就更加意义重大：是体现入侵者的霸权？或是维护民族尊严？台湾在日本统治时代称作“福摩沙”便是一例。20 世纪 50 年代，在国外的某聚会上，有人提议为福摩沙干杯，我某外交官员不经意间举杯回应，结果丢失前程。这是我们的翻译课老师给的第一课：译名在政治上代表着主权和话语权。

1877 年 3 月罗丰禄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留学并兼任留学生团翻译以及清驻外使馆翻译。1880 年回国成为李鸿章幕僚。由于能力杰出，身兼多职的他每月支取双薪，可见他是洋务派官员中的中坚。

1896 年 11 月，罗丰禄以二品顶戴出任清朝派驻英法意公使，是年 46 岁；正春秋鼎盛，又值国家用人之际，他的人生进入“风入四蹄轻，万里可横行”新阶段。

从翻译到大使，时至今日，依然是无数翻译学子职业梦里最绚丽最难的那部分。但是，罗



1900年罗丰禄参访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时英方铸造的纪念币

丰禄没有时间停下来为仕途喝彩。在国家多事之秋，他须分秒必争奔波列国：“博察天下郡国利痛之源”，对比中西文化，寻求“克免敌国外患”的根本。作为大使，他并不只是树立形象广交友或唇枪舌剑争权益。他还做很多“分外”的小事，比如考察英国的制币行业，引进他们的纺织生产线，延请治河的水利专家和矿山的采选工程人才。事无巨细，只要与实业救国相关，他就不遗余力。

西方报刊大力点赞他的务实和效率。

英国伯明翰造币公司甚至造出他的头像来纪念“中国的大臣阁下”的访问——无论文化如何迥异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对一个爱国者的崇高敬意是不分国籍的。

同窗严复对他的语言能力的评价是“凡书皆可译”。而大学问家、帝师陈宝琛则视他为挚

友，称赞他的国学素养深厚，“为学格致而外，尤深名法，故长于交于之事。治《易》《礼》，精《说文》。尝谓中西礼多同，思合其学为以”。指的是罗丰禄在弱国无外交的大势下，仍然在世界舞台上纵横开合，为国谋利，皆因他有深厚的国学学养。

罗丰禄对经世救国信仰的忠诚，通过优异的语言能力在外交舞台上散发出魅力，这从当时西方媒体的溢美之报道中可以证实。至今，哈佛图书馆不但保留着相关的报道，还有罗氏家族家谱。可以想象罗丰禄当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轶事便与翻译相关：他将杜甫《秋兴八首》之五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形式译出献给英女王，女王大悦，赏他骑士爵士。从此，罗丰禄在世界媒体上的头衔加上了 Sir Chih-Chen。

《秋兴八首》历来被认为是杜诗中的高华典籍，八首诗如交响乐的八个章节。吟唱时代苦难和羁旅之感，基调沉郁不宜送人。唯有第五首遥望京都致敬圣上略带辉煌：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罗丰祿能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里选出这首，又别出心裁化成莎翁形式的十四行诗——这种超出直译的“化译”便成就了口译史上的一段经典轶事。

今天，我们只能挑出莎翁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 18 首最相近的来看：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拟做夏日？（夏日可



罗园



到罗园的小路

以改成王母娘娘)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你可是更加温和, 更加可爱。(可爱可以改成亲切)。

其他各句以此类推。

这样译出来诗当然符合女王的口味。但是, 罗的意译又符合文学翻译的原则: 通过言与意, 文与理合一的翻译来传达出原诗语言中的创意和感情。这就是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 基于“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人类共性。因此, 罗氏的这一翻译确实是一个经典案例。同时女王授予他爵士也证明了女王的文学修养不错啊。

译员的别称是“一仆二主”——一方面要忠实于源语言, 另一方面要服务于目的语言, 这已经是千难万难之事。而作为外交家, 罗丰禄也肩负着“一仆二主”的使命。首先, 他必须是具有服从精神的官员, 同时他要坚持兼济天下的初衷。

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名言“外交无小事”, 曾是所有翻译的座右铭。从一国之使到见习翻译, 个人的言行代表民族和国家, 绝不可轻慢。

话说回来, 饱读西学通晓外语又如何? 翻译一首古诗与英女王周旋只是小小伎俩。罗丰禄未必觊觎那个骑士爵位。

内外兼修的学养又如何? 罗丰禄经世致用的使命感和爱国心是心头熊熊燃烧的火焰。但现实只是: 食君禄为君忙, 而理想之火与现实差距甚大, 罗丰禄自有罗丰禄的无奈和痛苦。

但是国难当头, 有能力挺身为国周旋的就是

真汉子。长松当风立, 霜后翠不改, 一览青史, 晚清经世派人物中, 几乎无人丘豁说梅扁舟论道。

与那个时代命世之英群一样, 罗丰禄也遇到了自己的滑铁卢——他跟随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多年超负荷的付出和违反初衷的现实, 何尝不是天才翻译家罗丰禄早早离世的原因?

风中鲲鹏折翼, 云上鸿鹄戛然断翅。1903年5月12日, 54岁的罗丰禄在家乡福州因病去世。

四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旅行”。他一直在行走, 不停歇地为国奔波, 只有死亡才能使他停下脚步。

暮色苍茫中, 我从麦顶小学朝坡下走, 在仓山中心小学对面的一条幽静小路, 终于与罗园相会。但长叩无应, 唯有镌刻在锈色斑驳的小园门前的“罗园”二字, 与我默默相向。

一弯冷月几颗疏星, 夜风起了, 在榕树林下回旋, 在芙蓉树梢飘荡。夜风轻叩窗台, 于是, 灯一盏一盏亮了, 人们都归家了。

尘嚣之外, 我, 依然痴痴伫立, 期盼着112年前远去的身影。

飕飕风声, 仿佛有辛弃疾的词响起:

我最怜君中宵舞,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 补天裂。

女翻译家薛绍徽的贤媛人生

陈 三

2015年8月23日，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三体》英文版第一部获得第73届“雨果奖”的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因此它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界的盛事，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盛事。

中国例无科幻之学，因国门开放，才引进这舶来文学。最早翻译科幻小说之举始于福州才女薛绍徽与丈夫陈寿彭。他们于1899年，首次翻译了凡尔纳的作品《八十日环游记》（经世文社，1900年）。此后，1902年梁启超撰写《新中国未来记》预言百年后的中国，鲁迅1903年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等……清末最后十年之间，至少有近百篇翻译或创作挂名“科学小说”，掀起了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第一个浪潮。

甲午海战失败后，思想家严复翻译了以《天



薛绍徽

演论》为代表的大量西方政治、经济、自然科学以及伦理学、哲学著作，为国家富强做思想启蒙；古文学家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出版了以《茶花女》《黑奴吁天记》等为代表的小说，在

文坛上引起人们对自由平等的思索，一时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称。作为他们同时代的福州籍翻译家，薛绍徽却显得那么寂寂无名。甚至在1996年编的《福建女名人》中，竟然查不到她的名字。幸而近年，薛绍徽，这个湮没在时光里的名字，经过一些女学人，如旅美学者钱南秀、福建省委党校教授林怡等人的研究整理与挖掘后，才宛如一曲坊巷里的未央歌，唱出让人心追神慕的雅韵。

一、养成

1866年9月，薛绍徽出生在澳桥荔枝园的薛家老屋。母亲邵儒人明《诗》《礼》，好吟咏，会音律、绘事。父亲教书，精于推算星盘。这样的家庭背景，几乎就定性了薛绍徽的志趣与爱好。

但奇异之处，不止在于她6个月就会开口说话，也不在于她3岁时，就必须要有姐姐讲“古典”才能睡觉——4岁时，薛家搬到七穿井，屋后有一个小花园。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桃李芳菲。家庭聚会时在花园玩，姐姐们都摘了各种花，绍徽只撷得一朵兰花。大家说她摘得太少了，她的一句“吾独能香”让妈妈听出某种意味和征兆——妈妈说，这小女儿头角崭露，将来必有所立。只恐怕她步步立异胜人，转乖谐俗之道。为了让女儿的成长更能与俗世的生活接轨，邵妈妈于是让她读《女论语》《女孝经》《女诫》之类的书，而她都能从书中得领旨趣，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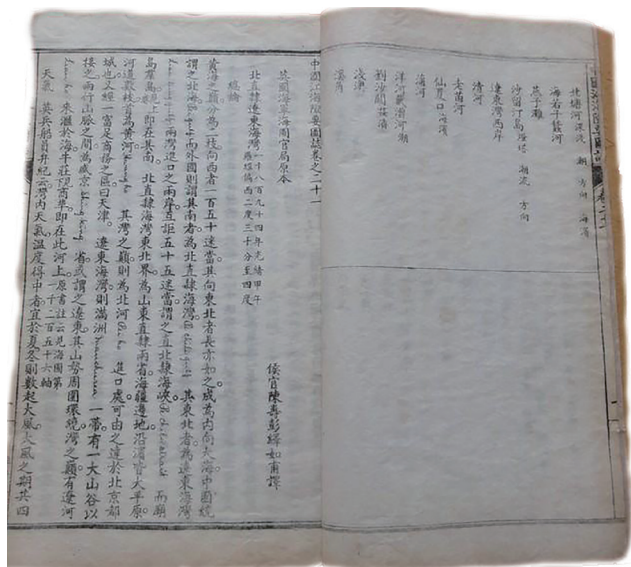
还常与姐姐辨析书语。6岁时她看母亲作画，趁母亲离开的时候，偷偷在母亲的画上添加烘染。邵妈妈回来发现她的添笔都能与原来的作品相映成趣，惊喜之余，开始教薛绍徽习画、围棋、洞箫、昆曲、刺绣等才艺。

梳着双蝶妆的薛绍徽，每日就在各种才艺的练习中，修行着她的德、容、言、工，在棋琴吟咏与女红中度过她的童年时光。她随着姐姐学刺绣时，口中诵咏着瘦子山的《枯树赋》等，邵妈妈都不禁笑了：你这是要考女博士吗？

薛绍徽平静的童年时光在9岁那年被一连串的意外打破。长姐出嫁，母亲肺癆去世，长姐哀毁过度也溘然长逝。父亲携哥哥去人家家里教书，又中暑暴病而亡。为赶“百日内”，二姐被夫家迎娶。三年之内，连遭三丧，12岁的薛绍徽与哥哥孤苦伶仃，寄居于姨姨家。过了年，哥哥16岁，被在广东的叔叔接走，剩下她陪着老方姨，好在她的绣件活计做得比别人都强，托卖花姬出售，价高且还卖得快，这样勉强度日。

二、婚姻

陈寿彭是船政学堂第三届学生，在船政学堂留堂5年，上练船两年，船政大臣沈葆楨赏识他少年聪隽，命习英文，兼驾驶术。1879年毕业回家备考科举，此时他的诗作已在当时的福州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才俊，自然有不少名门向他提亲，但迟至25岁，他仍是单身，直到遇上



陈寿彭译作《中国江海险要图志》

比他小 11 岁的薛绍徽。要论起他们的媒妁，实在是因为“诗钟”。

诗钟是一种文学的游戏，形式上似诗似联，是当时闽都文人的小爱好。除了大家府衙里的雅聚，坊间诗钟流传是以竞赛的形式出现。参与者每卷交数文钱，到最后评定时，按成绩分上中下等，各等有各等的彩头。

十三四岁的薛绍徽偷偷地冒着哥哥的名字参加了竞赛。“薛裕昆”之名几次得上等奖自然引人议论纷纷，传得多了，知道他根本不在福州，再后来，知道是其弱妹的杰作。

陈寿彭打听确切后就托人求媒。薛绍徽却不接受。理由是她的自主求婚？还是因为他此时也是一位贫寒的读书人？还是仅仅出于矜持与矫情？直到已出嫁的二姐英玉也回家替陈寿彭说

话，说他才高性傲屡却婚，说他文才口碑都不错，“相如岂会长贫”……这些都没打动绍徽，直到在广东的叔叔们的主持下，薛绍徽才同意了这桩婚事。

陈寿彭原来常常与朋友们在一起斗诗文，新婚不久，他的朋友王荔丹等人曾经向陈寿彭的四哥陈季同抱怨说：作诗作文，本来我跟他差不多，现在他有了内助，我就抵挡不住了。

陈季同呵呵一笑，说出初见弟媳妇的感觉：新妇度态雍穆，殆所谓林下风？“林下风”语出《世说新语》，指的是咏吟出下雪诗“柳絮因风起”的才女谢道韞。她在《世说新语》中被归类为“贤媛”。

三、四兄陈季同

陈季同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与严复同期留学欧洲，后任翻译，游历诸国，并成为大清国风流倜傥的外交家。曾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驻比利时、奥匈帝国、丹麦和荷兰等国参赞。

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陈季同在演讲台上颠倒众生：“他身着漂亮的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饱满的面容，年轻而快活，面带微笑，露出漂亮的牙齿。他身体健壮，声音低沉有力又清晰明快。这是一次风趣幽默的精彩演讲，出自一个男人和高贵种族之口，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

感到他内心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小孩……听众情绪热烈，喝下全部迷魂汤，疯狂鼓掌。”

这是 1889 年 2 月 18 日陈季同在巴黎的一所高校里所做演讲的一个场面。

他是向外国输出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在晚清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他独标一帜“中学西渐”。他的《中国人自画像》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对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发表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人独立从事此种文化交流活动的先河。书中，将一个文化悠久、江山如画而有独特东方隽味的古国直接展现给法国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现实中国的偏见。他一生用法文写作了 8 部作品，分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4）、《中国人的戏剧》（1886）、《中国故事集》（1889）、《中国的娱乐》（1890）、《黄衫客传奇》（1890）、《巴黎人》（1891）、《吾国》（1892）、《英勇的爱》（1904）。除了最后一种外，其他著作都在巴黎出版。

陈季同风度非凡，曾在法国留学和从事外交工作近 20 年，阅人无数，在欧洲德皇、德总理俾斯麦、法国的政界要人都与他相熟，更令人称诧的是他竟然还是大清最早娶法女赖妈懿和蒯爽为妻的官员，赖氏毕业于女学堂，蒯爽还是女博士！足见其魅力！

陈季同除了在文化上成就卓越之外，在外交上也相当杰出。此不赘述。1892 年因被同僚陷害入狱，陈寿彭与薛绍徽把自家所有产业出售，积

资入都营救。此举亦足见薛绍徽之“贤”。

中法马江战前，船政商调，安排陈寿彭任大副。绍徽以他性格不适合任此职劝阻。于是，陈寿彭接受洋监督之聘，充当翻译，游学于英法等国。4 年间，薛绍徽独自在家一边苦学，一边持家。

1889 年，陈寿彭回国参加科考，中了副榜第 8 名。在高兴之余，二人在乌山脚下购置了黛韵楼，作为藏书之所。因为在楼上可凭栏望山色苍翠，所以叫“黛韵”。今天我们还能记起这座已湮没在红尘中的诗情画意的小楼，是因为薛绍徽的文集曾以此为名，叫《黛韵楼遗集》。我们还可以把“黛韵楼”理解为他们的爱情小屋。在营救陈季同的过程中，这座小楼亦被卖掉。

1893 年，陈季同的案情得到平反后，当年秋天，永定河洪水崩北岸，京畿震恐；因为陈寿彭曾习水学建筑法，因此朝廷令兄弟二人测绘水势。他们建议于卢沟桥筑坝减水，通大清河，到了次年夏，终于功成。

四、译事

西方最早多以科幻作品普及科学思想。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人们对科幻的爱好大为流行，与此时期科学的发展，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广泛应用有极大关系。凡尔纳为代表的科幻作家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写了大量科幻题材的传世之作。

1898年，陈寿彭算起来已苦读经书30年，又游历了大半个地球，从东洋到西洋，可谓学贯中西。尤其是在欧洲学习与翻译时，他搜罗了36国语言的600多部经典、图集，携带回国。在宁波储才学堂讲授中、西学课余，忧报时艰的他收集国外资料，开始辑录、翻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1906年成书，32卷，地图208轴，《格致正轨》10卷）。译事之余，陈寿彭夜间与薛绍徽聊谈外国列女事略和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但像很多自然科学学者一样，他多数译《格土星》《英国十学校说》《火器考》等科学、工程论著，认为翻译小说、故事是雕虫小技，故鄙而不为。

对一个晚清深闺的妇女而言，最早听到陈寿彭转述这个故事时，薛绍徽像聆听海客奇谈一样不可思议。或许受了林纾不懂英文也能合作翻译出《茶花女》并风靡一时的影响，薛绍徽灵机一动，当即觉得可以做陈寿彭的补充，来完成这个翻译。

于是，客寄宁波，清闺凉灯，她开始了夜夜与陈寿彭“耳提面命，伸纸濡笔”的翻译生涯。全书故事情节生动，起伏有致，所以大约仅用了半年就译成了。在书的序言中，薛绍徽陈述最大的感受是“来越梯航，无分轸域”（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全球化”视野），以及通过述说故事，达到科学普及的目的——“以惊心骇目之谈，通格物致知之理”。这也成了她翻译此书的目的。书中，福格这位知识分子，高尚的志趣与

行径，一路行走的异国民俗，都引起了薛绍徽的注意。而她尤为注意到的，是在历艰行履的旅程中，主人公的理性和信仰，“凡此艰难，胥关智力，全凭忠信，利涉波涛”是主人公最终赢得赌局的力量。

对这本“格磔钩辘”的外文翻译，她“变六书之妙法，会意谐声；烦重译之苦心，钩玄索要”，这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

同严复的苦恼一样，当时留学回来的学生因没有“功名”志不得展的情形很普遍。包括陈寿彭也是如此，一直到1902年。当年7月，薛绍徽随夫寄居上海，课女咏诗，呼儿作绘。一天，陈寿彭携一本外文书回来，告诉她这是《双线记》。于是旅灯之下，二人再次合作，一个“出口成章”，一个“濡笔待润”。棘闱放榜，陈寿彭中了第30名举人，于是买舟南归，舟中依然橐笔不辍。成书时是10月中旬，陈寿彭又要赴沪省兄，并准备次年的科考。薛绍徽完成此书并作序赠行，序里对二人“书案双凭”的合译夜读有一番深情的描写。薛绍徽是一位深受《女诫》《女训》指导而又富有才情的女性。她把合译当作是“调言语之侏离，佐帷房之欢谑”的风情之事，并衷心乐之——她借《双线记》的男女主人公爱情，表明：道其道而言其言，不外贪嗔痴爱；色是空而空是色，别成开合文章。最后她在诉说将要面临的骊歌别情时，希望陈寿彭能在次年“宫花马策”，然后二人“并看鸾镜芙蓉”。这一年她



薛绍徽、陈寿彭的《八十日环游记》译作



薛绍徽、陈寿彭编译的《外国列女传》



薛绍徽的文集《黛韵楼诗集》

37岁。

五、关于“女性”的独立思考

陈寿彭与薛绍徽述谈过的《外国列女传》却迟至两年多的时间才完工，1906年才出版。薛绍徽对所著的这些外国列女的行径、“男女平权”之说心底是将信将疑的，并称只是作为资料而据事直书，“至于褒贬且留皮里”。

这与她的文化养成有莫大关系。

早在1894年，甲午海战全军覆没。30年的洋务，经甲午一役，被证明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四万万人齐落泪。

有识之士要求变法维新社会呼声越来越高。

为了宣传维新，各地竞相办报。康有为首先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次年更名为《中外纪闻》），上海则于1896年由汪康年创办《时务报》，新锐青年梁启超先后在两家报馆任主笔。1897年，在严复等人于天津创办《国闻报》的同时，陈寿彭与其兄陈季同一同创办《求是报》。这是一份综合性旬刊。出版的内容是“断自甲午”，取各省紧要并案、各使馆档案，分类编撰。主要内容分内编和外编，内编又分设实事、附录，外编分西报译编、西律新译、格致新编等。

为救亡图存，各地还创办了种种学会。陈季同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康梁等人在上海讨论筹建民捐民办的“女学堂”。他们提出必须兴办女子学校。洋四嫂赖妈懿原是法国女学堂出

身，因此她草拟“日课章程”。梁启超为女学董事会起草了《创设女学堂启》：“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妇女受教育，得一技之长，可以养活自己，女子有德才，可以使家庭和睦，邻里融洽。从教子入手开启民智，培养中国的贤妻良母，可以壮大民族救亡的革命队伍，可以达到种进国强……”陈季同遂邀请弟妹薛绍徽加入。

但薛绍徽并未如康梁一般，觉得女学可以承当这么多社会重责。

她读到梁氏的《启》文后，首先就反驳梁氏的“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把中国积弱归咎于妇女。薛绍徽指出，几千年历史要求妇女严守闺门，而今又指责二万万中国妇女为惰逸无用！

她还提出：“女学”固然好，但学习的目的绝不仅以要妇女就业加强国力，扭转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失败为目的——而是要使她们得到最好的向学机会，培养她们成为多才多艺、学贯中西的人才，以备国家之选。她还提出，“女学”章程应中西兼容，尤其应保持中国“母训”传统，融妇道、才艺为一炉。

她对女学的思考绝不是跟风式的。对女性运动也如是。

比如当男权社会一窝蜂地在全国掀起放足运动时，她的思考就超越了“缠足放足”的“坏与好”的道德评价（“缠者俱宜一齐放却，换骨无丹断头莫续。必欲矫情镇物，势成非马非驴”）。她提出，让女性自己做选择，才是真正的尊重与

明智：“宛转时趋，各随妆束。是缠之固属无妨，即不缠亦何不可耶！”她提出文化在维系日常世界中具有强大的力量，女性能够从传统道德修养中提炼出精神，使自己具备日常生活能力甚至由己身扩展到社会上的作用的“道”，这才是女性应该做的，而不纠结于缠不缠脚（“女德能修，妇道乃备。凡所谓强种强国兴业持家之说，又在此不在彼矣”）。

这一年，第一家《女学报》在上海创办，薛绍徽被邀担任女主笔，她为《女学报》写了一序言和《德》《言》《工》《容》四颂。这些内容显然与提倡女学、女权和鼓吹婚姻自由的《女学报》宗旨异趣。其后苏州女学创办时亦邀请她主讲，她都谢绝了，理由是：“吾学本好古，世人多趣今。今古不同道，休劳一片心。”

然而，时代的潮流毕竟轰鸣前涌。

她担心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来，担心索非亚式的革命女性出现，而具有意味的是，在她之后福州还真出现了这样的女性，如林宗素与方君瑛。吊诡的是，林宗素从一个小脚女子成长为革命家的最初启蒙，也许就是她最喜欢捧读的《外国列女传》。

薛绍徽终于没有迈过“民国”的门槛。而比她小一轮的代表人物出现在时代的风口，已与她们大不相同，如秋瑾，如林宗素，再后如林徽因等。等到后一辈人物出现的时候，她在《外国列女传》序言中所冀望的“静女其姝，善心为笄，永毕永讫”已经渐行渐远。

高名凯，福建平潭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语法学家和翻译家，是他最早将巴尔扎克的众多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他在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中国 20 世纪语言学的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为其子女高倓、高环、高苏、高熹合写的回忆文章，透过日常生活的点滴，再现了老一辈学人勤勉、真挚、终其一生为事业付出的精神。

我们的父亲高名凯

高倓 高环 高苏 高熹

家父高名凯先生 1911 年 3 月 28 日出生于福建省平潭县苏澳区先进乡土库村。祖父高哲善先生是美以美教会牧师，做过福建神学院监学，他因食物中毒辞世时，父亲才 6 岁。祖父留下二男二女，父亲排行老二，是次子。祖母郭氏病逝时父亲年仅 13 岁。幼年丧失父母，家庭生活十分艰难，但也使他自幼养成了独立处事、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父亲 7 岁开始在福建省平潭县苏澳区先进乡土库村读私塾；10 岁即 1921 年秋入平潭开宗小学；12 岁，由堂兄高诚学先生带往福州，入进德小学；13 岁，转福州英华中学小学部；14 岁即 1925 年秋考进英华中学。从初中到高中，6 年的

中学阶段，父亲除获得学校给予的奖学金外，每学期课余还要为学校擦洗门窗、地板或打钟，寒暑假期间也留校做工，以筹集膳费和住宿费。父亲小学、中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国文和英语尤为突出。英语曾获福建省中学生英语讲演第一名，作文经常张贴展览。他还协助编辑平潭《晨星报》，宣扬爱国进步思想，并用笔名（越石）撰写文章、小说，刊登在福建的《民国日报》《南方日报》上。而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省教育厅清寒奖学金，得以于 1931 年秋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深造，4 年后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37 年 9 月由燕京大学派遣去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部学语言学。在马伯乐（H. Maspero）教授指导



高名凯在瑞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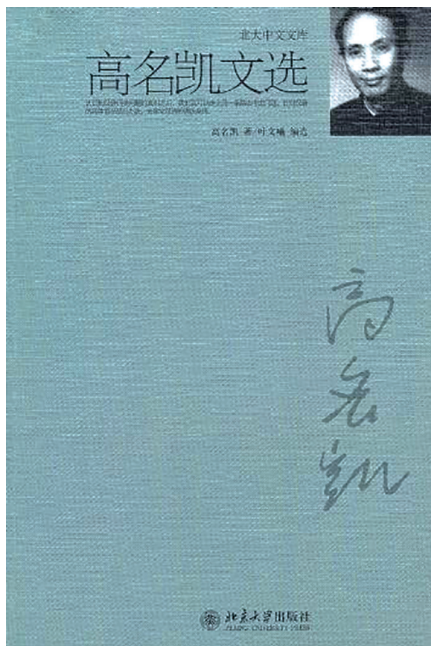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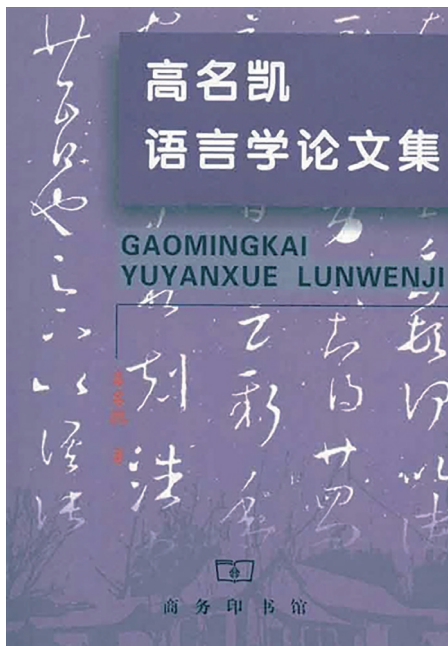
高名凯与夫人

下完成学位论文。1940年5月获文科博士学位。父亲在法期间刻苦学习，图书馆是他每天必去的场所，正是在那里博得已在法生活和工作9年、任职里昂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的陈幼兰女士的芳心，并于1940年5月19日与我们的母亲陈幼兰女士结婚，1940年6月与母亲回国。因战争影响，苏伊士运河不通航，以至必须绕道好望角。轮船在海上漂泊8个月，及至亚非各地，直至1941年1月才回到北平。我们的母亲除擅长图书管理，还曾获法国里昂大学艺术史硕士学位，在法语、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与父亲拥有共同语言。他们酷爱法国文学，迫切希望把法国最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20世纪40年代

初，父亲开始着手翻译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他是最早将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作品介绍到中国的翻译家之一。在战乱期间，他日以继夜使用尊重原文、着重直译的翻译手法，高强度进行翻译。他坚持认为这样做能更好地体现巴尔扎克的语言风格及文章旨趣。

他的大量译本对巴尔扎克和法国文学的研究有很大价值。他的翻译体现了巴尔扎克的语言、文学、艺术、情操及风格，可视为中国版的原版巴尔扎克。

当年我们的母亲放弃在法国的工作，跟父亲一起回国患难与共，互敬互爱。不幸的是，母亲40岁时就重病缠身，卧床不起。父亲对她一如既



高名凯著作

往，情深如故，没有和母亲吵过一回嘴。我们的父母谈话很风趣，有时他们谈起“悄悄话”，就用法语，对我们在场的小孩子“保密”。母亲还经常强忍病痛支持父亲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母亲去世前不久，我们放学回家跑到楼上母亲房间，看见床头柜上放着父亲的手稿，母亲正在竭尽全力用颤抖的手帮父亲校对文稿。

母亲重病时，父亲时常坐在母亲的病床旁边，拍抚她的肩膀，安慰她。为了给母亲多一点快乐，在国内刚开始有电视机时，父亲就给家里购买了苏联产电视机，一心为的是给身患病痛的母亲一些快乐。父亲和母亲喜欢鉴赏中国字画，他们曾把共同收藏的海瑞的砚献给故宫，并向我

们郑重表示过，他将把收藏的文物全部献给国家。

1961年5月11日母亲去世，父亲万分悲伤。为了纪念他的结发之妻，他特邀请著名书法家郭风惠先生书写多达千言的墓志铭并石刻，树立在八宝山人民公墓的墓穴上。可惜，“文革”中遭到彻底毁坏。

燕东园32号是我们全家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住所，也是父亲著书立说，为语言学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地方。我们眼前总是浮现父亲在那间狭窄的书房里伏案写作的情景，他的桌面上上下左右都是半翻开或翻开的带有记号纸条的许多书。书桌中央是他书写的厚厚的书稿，右手边是一个深灰色的六角形烟灰缸，里面布满了长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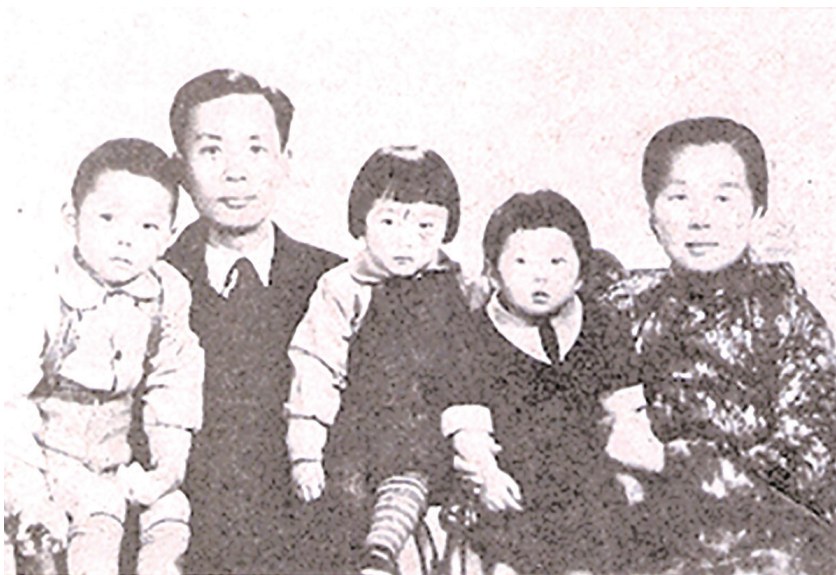
不齐的烟头和烟灰。他爱吸烟，而且是酷爱，好像不吸烟就不能思考问题，不能生活。一旦思维告一个段落，便捻灭一个烟头。他的周围是五六个装满各国文学书籍的书架。在书房内还有一个贮藏间，里面装满了父亲的手稿。他爱思索，而且十分敏锐。他很少离开书房，就是在晚上也总是写作。他在伏案工作的照片上题写了四个字：日日如是。他的书写能力是极为惊人的，有时一晚上能写一两万字。虽然那时我们年龄都很小，但看见爸爸繁忙的工作情景，我们从来不敢前去打扰。我们知道父亲的工作十分重要。只有当他要我们帮他买烟时，我们才会到书房接过几角钱，很快跑出门，到离家不远的郭家小铺去购买“恒大”或“大前门”牌的香烟，然后速速跑回家，一声不吭交他手里，完成任务。

他工作起来全神贯注，以致时常在开饭时，保姆招呼父亲来吃饭，他总是好像没听见，第二次、第三次招呼过，他才匆匆下楼，旁若无人，呆呆地在饭桌上，胡乱夹一些饭菜送到嘴里。看得出来，他根本不知道饭菜的味道。他脑子里还全是《汉语语法论》《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语言论》……

父亲为人正直坦率，诚恳热情。他的学生来了，他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与他们愉快

地交谈，神采奕奕地讲授，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总是声音充满激情，铿锵有力。他与同事有时也有争论，但都是开诚布公的愉快的讨论与研究。他常留学生与同事在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当然忘不了要谈语言学的课题。记得在我们年幼时宋玉科、陈法卫、王文襄是父亲的学生，而后陈松岑、余钟惠、贾彦德、李兆同、李行健、赵世开、叶蜚声、殷德厚、王福堂、王理嘉、武彦选等也都是他的学生，刘正琰、徐通锵和石安石更是我们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

虽然父亲在国内国外都是有影响的学者，但他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对待学生，他诲人不倦，亲如家人。记得，那时石老师的夫人在外地工作，两地分居，父亲主动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家庭幸福着想。



20世纪60年代，高名凯与家人合影



高名凯在香山



1962年教研室语言学概论编写小组合影,右三为高名凯

每到新年、春节，母亲一定安排二女外出购置年货，准备好充足的水果、花生、糖果、杂拌果脯、瓜子、小点心等食品，欢迎一批又一批给父亲拜年的学生和朋友们。那也是我们特别兴奋的时光。父亲在女儿在场的时候，总会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们家里还有三朵花。”

父亲讲课逻辑性强、生动，使人如沐春风。他在患病期间还带病上台讲课。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心血教诲学生，以自己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传授知识。

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分繁忙的前提下，还承担许多社会工作，曾先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入盟的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在民盟总部和民盟

北京市支部任职。他还出任过北京市教育工会的文教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及常委。曾任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他在20世纪50年代民盟的活动中努力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反映知识分子的意见和要求，为民盟当时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即使是系工会向他要一篇黑板报稿，若要求星期六交稿，他星期五准完成。

父亲的眼睛又黑又亮，炯炯有神，眼神充满了自信和力量，既刚毅又热情，既温柔又亲切，极具魅力和感召力。在我们的记忆中，无论什么人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能滔滔不绝地回答出来，旁征博引。除了与同行知识界的同事、朋友和学生经常交谈外，他的兴趣还非常广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为调节情趣，有时打打桥牌、下下围棋。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徐献瑜、化学系教授邢



20世纪60年代，自左向右高苏、高熹、高环、高名凯、高倬

其毅都是他的棋友。父亲喜爱京剧、字画、音乐，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艺术形式，他都汲取其中的养分充实自己。陈伯流、李立睿夫妇，俞大綱、曾昭伦夫妇，龚祥瑞、方备夫妇，以及徐悲鸿、朱光潜、李四光、邓之诚、翁独健、罗大纲、褚圣麟、许德衡、严济慈、雷洁琼这些科技、文化名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手足之情的陈伯流、翁独健、龚祥瑞更是经常与父亲促膝谈心，互敬互助。他们是父亲的患难之交，终生的朋友。父亲去世之后，他们仍对我们子女十分关照。陈伯伯、陈伯母在我们兄妹生活困难时始终帮助我们。

父亲懂得许多国家的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朝鲜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缅甸语、越南语、印尼语等，对国内一些地

方方言也有许多研究。他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工作，积累知识，丰富头脑。他的脑子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随时可以解开你思考中的疑团。这是何等的精神才能铸成啊！他生命不息，工作、学习不止。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他喜爱的语言学事业上，把他的爱献给了他的学生。

父亲难得有时间关心我们的学习。一次，他决定教我们德语，但只坚持一个多月，就被学生、同事来访挤掉了。他总感觉自己对子女照顾得少了。每当我们学习取得好成绩，他也总会由衷地高兴。

父亲对人真诚、忠厚，生活极其朴素，他从不讲究吃、穿、玩、乐。他回国时携带的行装寄存在外地因战乱丢失后，长期以来仅有一件呢子大衣、一身西装和一身中山装，很少添置。而我们的大伯父、两个上大学的姑姑及他家乡的生活困难的一些亲属、朋友却得到他长年的接济。

父亲的成就是可贵的，他的勤奋献身精神、追求真理的惊人毅力更让我们佩服。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他是抗日救国活动的积极分子，是著名的《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的起草人。宣言用浅显的语言、深刻的内容、犀利的文笔感染大众，它的问世被称为“一二·九”运动的前奏。他言行一致，为自己追求的事业做出了终身的奉献。从法国回国时他断然拒绝给日本人做事。抗日胜利后，他又毅然拒绝做国民党政府的福建省省长，专心学术研究，为语言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年日本中央

学院大学讲师内藤正子女士访华时对我们说：在日本所有研究汉语的人都要学习《汉语语法论》，都知道高名凯。父亲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在苏联、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影响，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许多知名大学的图书馆里都有他的著作、研究记载和译本。

父亲的爱国情怀和崇尚和平的真挚热情融化在他的血液中，在我们子女四人的出生起名上也有所体现：长子高倓是1941年11月生人，那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战，起名“倓”字，寓意平和，向往和平。长女高环，起名本是“还”字，而后改为“环”，意是1943年，正是日本人侵略中国北京沦陷之时，还我河山便是父亲内心的激情。二女“苏”字的得名，是1945年9月，日本投降协议签订，中国人民苏醒了，因而定名。小女高熹生于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熹”字寓意早晨，代表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中国即将诞生。

父亲的娱乐时间是极少的，以至于我们几个子女很少享受到与父亲同游玩的欢乐。但我们记得很清楚，母亲去世后，父亲带我们四个孩子一起到颐和园去玩，只有一次，有照片为记，这还是在母亲去世后才享受到的。他为了安慰我们，主动安排每周五晚带我们到五道口一家茶点铺一起吃茶点。虽然没能坚持下去，但这毕竟是我们生活经历中的幸福回忆。

1965年1月3日，我们的慈父高名凯先生正值学识有成、才华横溢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年仅

53岁。可就是在这短短53年的生涯中，父亲以对语言学和哲学执着的追求与热爱，凭着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拼搏与奋斗，著述宏富，成果数量在学术界是很少见的。

非常遗憾，我们四人都没有研究语言学，但父亲一生执着语言学研究，在坎坷不平的学术道路上那坚忍不拔的毅力始终在鼓舞和鞭策我们。我们的下一代也都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为事业而拼搏。父亲热爱艺术，曾藏有大量京剧唱片，经常听唱，还参加学校京剧票友演出。在波兰、苏联讲学时带回许多古典名曲唱片，如芭蕾舞剧《天鹅湖》和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等。家里周末总是要听古典音乐，促成长子高倓选择了艺术的道路，成为优秀的音乐教育家，并影响、教育了长孙高翔从事小提琴艺术。高翔30岁时，任美国德林威尔大学音乐系终身教授，频繁地活跃在国际、国内的音乐舞台上，为中华民族争了光。

父亲坎坷的人生经历，繁重的家庭负担，超负荷的教学、学术研究和社会工作，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南方讲学的经历摧毁了他身体支撑得住的最后防线。他病倒了，确诊为肝炎。从1963年春起前后三次住进北京医院，1964年10月后，病转亚急性肝萎缩，医治无效，于1965年1月3日病逝。

他在病床上强忍病痛吟诵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14个字是他给我们的遗言，也应是我们要做人的准则。

闽都多译才

林本椿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倚山靠海，自古就有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港口，鸦片战争以后又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近年又是中国最早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频繁的对外交流没有翻译参与是不行的，因为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也正是通过这种沟通交流，促使福州译才辈出。

林则徐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虽不懂外文，但他是一位杰出的翻译领导者和组织者。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收集了许多外文报纸书刊，并组织自己的翻译班子为他译“夷书”。他的译书活动开创了系统研究西方的先河，对近代思想界起到了宝贵的启蒙作用。

康有为曾说“译才并世数严林”，指的是福州才子严复和林纾。严复堪称译界楷模，他是第

一位系统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及社会科学方面著作的翻译家。他一生的主要译著有8部：《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说》《群学肄言》《社会通论》《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这8部译著不仅满足了国人寻找真理、认识和学习西方社会的迫切需求，且为救国图存的知识界打开眼界，给予他们有力的思想武器，对启迪民智、改革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三字翻译理论，1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和翻译学研究者，至今还没有失去生命力。无论是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方面，严复都为后辈翻译工作者树立了楷模。林纾无愧于“译界之王”的称号，他不谙西文，却通过王寿昌等留洋学子的口述，用27年时间翻译了180多部西洋小说，

在中国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空前的。这些小说为国人开启了一扇通往西方文化的窗户。作为中国近代小说翻译第一人的林纾及林译小说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文艺思想和创作思路。而他的翻译实践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至今还有不少人在研究林纾的翻译。

罗丰禄、王庆骥（王景岐）、凌青和罗旭都是活跃在外交阵线上的翻译家。罗丰禄曾任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兼翻译，几乎在所有重要外交场合，他都要参加翻译。李鸿章长于口才，说话极快，但罗丰禄的口译是那么吻合巧妙，“折冲樽俎，仪态安详，口操五国语言，应对如流，碧眼虬髯者，自惭不及”。虽然弱国无外交，但罗丰禄还是以他的学识和胆略，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王庆骥在法留学期间就曾兼我国驻法公使翻译，回国后，历任外交部主事、中俄蒙恰克图会议参赞、外交部参事、驻意大利使馆二等秘书，参加过巴黎和会，还曾担任驻比利时公使、外交部顾问、驻瑞典并挪威公使、驻波兰公使。王庆骥与林纾合作翻译的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两部，却别具一格。这两部作品是法国作家森彼得著的《离恨天》和孟德斯鸠的书信体小说《鱼雁抉微》。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凌青是林则徐的五世孙，1944年，他奉组织之命前往延安，分配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外事组，就是在这时开始和翻译结下了缘分，因为他要负责与当时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联络、翻译和接待工作。1945年1月，他开始给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老一代革命领袖以及叶剑英、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英文翻译。1953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担任机要办公室主任和翻译队的队长。罗旭的曾叔祖就是清末杰出的外交家、翻译家罗丰禄。1958年毕业后，罗旭调入外交部，在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做法语口、笔译工作达14年之久。1972年她曾在外交部非洲司、新闻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西欧司等部门任职，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经常为中央领导同志做口译。她和唐闻生等人被称为外交部口译“五朵金花”。

陈季同和陈寿彭可谓兄弟翻译家，而陈寿彭、薛绍徽伉俪当然是夫妻翻译家，一门出了三位翻译家，堪称翻译史上的佳话。陈季同为东学西渐第一人，他率先把《聊斋志异》译成法文，译作名为《中国故事》。陈季同最早独立翻译了《拿破仑法典》。他还翻译了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及剧本《吕伯兰》《欧那尼》《银瓶怨》莫里哀的《夫人学堂》及左拉的《南丹与奈依夫人》等著名作品，成为近代中国“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是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他的胞弟陈寿彭（字逸如）在其引导下，留学欧洲，成为晚清出色的翻译家。1900年，陈寿彭口译、夫人薛绍徽笔述，率先将《八十日环游记》译成中文，掀起凡尔纳热潮。陈寿彭还译了《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22卷，1900年由经世文社出版。

陈衍是与严复、林纾同时代的翻译家，但



林纾



王寿昌



陈衍



凌青



陈羽纶

他专译经济类著作。他主持并参加翻译、出版了《商业博物志》《货币制度论》《商业经济学》《商业开化史》《商业地理》《银行论》等书，向国人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金融、经济理论，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借鉴西方有关法令，使中国商业的管理趋于规范，进而振兴商业。

王寿昌是林纾翻译的第一位合作者，口译《茶花女》第一人，他造就了一位不懂外文的著名翻译家。唐钺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心理学及哲学名家著作，如穆勒的《功用主义》、康德的《道德形上学探本》、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兰德的《西方心理学家文选》以及马赫的《感觉的分析》等。著名作家郑振铎一生不仅著述丰富，他发表的大量译作、译论在中国翻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翻译过的俄国著名作家作品、论文、序

文、论著等共 20 多篇（部），是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最主要的译者，翻译出版了《希腊神话》，而且还翻译过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的民歌、高加索民间故事以及欧洲童话《列那狐的历史》等。许孟雄首次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多篇著作译成英文，同时还翻译了大量有关抗战的文章，陆续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让海外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时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斯诺看了他的译作，曾对他的精湛译艺大加赞赏。梁遇春虽英年早逝，在短短的生命中还是翻译了二三十种外国文学作品，如《英国诗歌选》《英国小品文选》《草原上》《摩尔·弗兰德斯》等。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林同济是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的专家。严群继承其伯祖严复的信、达、雅标准，译著有《泰阿泰德》《智术之师》《苏

格拉底的申辩》等，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陈彪如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翻译有美国菲歇尔著《利息理论》、英国米克著《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美国狄德著《凯恩斯经济学》、美国勒纳著《统制经济学》、英国李特尔著《福利经济学评述》、美国阿克利著《宏观经济理论》、英国罗宾逊著《现代经济学论》、美国贝尔与克里斯托尔合著《经济理论的危机》以及格鲁伯与沃克尔合著《服务业的增长》等9部西方经济学名著。高名凯是我国著名的理论语言学家，在语言学方面著作颇丰，但他也翻译过罗素的《哲学大纲》。陈羽纶是《英语世界》创办人和总编，1944年应征赴“二战”印缅战区任史迪威将军指挥部校级翻译官，后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高级编辑，还自译与合译文学、传记、政治、经济、哲学等著作二十几部，如《福尔摩斯探案集——冒险史》《愤怒的尘土》《林肯传》《美帝国主义论》《反潮流：经济学批判文集》和《实用主义》等，其中《福尔摩斯探案集——冒险史》和《实用主义》是影响力较大的两部译作。张培基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学教授和翻译家，译著专著颇丰，他翻译的3卷《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他主编的《英汉翻译教程》长期被许多高校使用。罗郁正教授长期在美国从事东亚语言和文化教学，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出版了不少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和译作，其中他和柳无忌先生合作编撰介绍中国民族5000年诗词的《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中、英两

个版本出版后在美国出版界引起了轰动。郑雪来26岁时开始主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的翻译工作，后来还翻译了著名的前苏联电影文学剧本《乡村女教师》《海之歌》《告密者》《列宁的故事》《他永远活着》等。林光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高级编辑，同时还是西班牙和拉丁文学的翻译家，他的重要译作《回首话沧桑——聂鲁达回忆录》影响很大，还有《阿玛莉娅》《胡亚雷斯传》《拉丁美洲散文选》《聂鲁达散文选》《居里夫人传》等译著。黄为葳教授译著颇丰，20世纪80年代末他先后把《郭沫若文集》（第5卷）以及《中国人的恋爱、婚姻、家庭》《在滇西南的峡谷里》《中国之最》《中国社会两性心理之差异》《中日两国流通领域之比较》《忠信教育法》等书翻译为英文出版。后来，他受耶鲁大学委托，与耶鲁大学汉学家班大为合作，将《尚书》译成英文出版。李景端教授是翻译出版界知名人物，《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的创建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近年他在翻译打假维权方面所做的贡献，译界有口皆碑。

福州才女多，除了著名的冰心、卢隐、林徽因和“九叶诗人”郑敏，还有不少才女如沈师光、陈珪如、李君璿、蓝馥心都在翻译方面颇有建树。冰心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硕果累累的翻译家，先后翻译了《先知》等8个国家50多部作品，包括诗歌、诗剧、民间故事、书信、小说、散文诗等多种形式。晚年，冰心还与老伴吴文藻先生一起参加了《世界史》和《世界



冰心



林徽因



郑敏



沈师光

史纲》的翻译工作。人们只知道才貌双全、多才多艺的林徽因在建筑设计方面的杰出贡献，却不知道她也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浪漫派散文诗《夜莺与玫瑰》，发表在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九叶诗人”郑敏也是著名的诗歌翻译家，译有诗集《美国当代诗歌选》。陈珪如译有《唯物辩证法教程》《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李君璵是复旦大学生物学教授，译有《昆虫病理学原理》《普通微生物简明教材》《工业微生物学》等。蓝馥心从事电影翻译编辑工作，译有电影文学剧本和电影表演理论的著作。她从英文翻译苏联作家A·苏洛夫著名的四幕十场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由东北人艺首演后，全国各大剧院（团）亦先后列为重点剧目，举国轰动；后来又翻译、导演英国故事片《百万英镑》与南

斯拉夫故事片《当机立断》。其主要译作还有华克坦戈夫（苏）《我所要求于演员的》和《达尔文》1-5集以及布莱希特（德）《三分钟歌剧》等。沈师光是清朝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的玄孙女，其翻译作品主要包括史蒂芬·孔茨（美）的《迷惘的入侵者》、沃莱·索因卡（尼日利亚）的《痴心与浊水》、阿瑟·黑利（加拿大）的《大饭店》、罗曼·罗兰（法）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及戴维·罗尔（英）的《圣经——从神话到历史》。她还担任过《大英百科全书》的分类责任编辑、主要译者及审校者。

福州是近代翻译家的摇篮。以上粗略介绍了30多位福州籍翻译家，虽不全面，却足见闽都译才之多，而且译才多样，涵盖各个领域。福州籍翻译家的爱国情怀、恪守译德的风范，更是一项值得传承的珍贵传统。

优雅人生淡如菊

唐 希

这是典型福州好男人的故事。一个平凡人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一

这是福州坊间偶然之中必然的故事。宿命中含着人生的选择。

这则古旧的故事，要从三坊七巷改造工程动迁后的 2007 年说起。

2006 年 6 月底，福州三坊七巷挖开了动迁改造的第一铲。2007 年夏秋时节，是私有产权住户较密集地迁出的时间段。远在北京的中国老照片网的创办人全冰雪几经周折通过网络从福州旧书商手上收购了一本据说是从三坊七巷流出的老相册。

相册的男主人公从 1907 年到 1968 年，62 年连续拍摄了 62 张肖像，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三个历史阶段。主人公也从英俊青年渐变为耄耋老人，相册还原了一个人从风华正茂走向暮年的过程，其中一张 1901 年拍摄于英国伦敦的个人照，附带着福州知名画家陈子奋为主人公题写的书法“是寿者相”，称照片主人为“景吕先生”。

全冰雪先生将考证后的资料写成短文《珍贵老相册 急寻知情人》，附上老者 1968 年最后拍的肖像，刊登在 2007 年 11 月 6 日的《福州日报》。当天就有了反响。第二天，日报发文将从景吕孙子叶林及知情人那里了解的情况刊发：老人姓叶，家住宫巷，能讲标准英语，曾经随晚清外交官罗丰禄出使英国。还附上三幅照片。罗丰禄的孙子罗孝逵也一眼认出报上刊登的肖像是“叶先生”，证实了叶景吕与罗家的关系。

2008 年 10 月全冰雪来到福州采访了叶景吕和罗丰禄后人，后转道杭州采访叶景吕的女儿叶



叶景吕肖像展

圭英，还与远在台湾的叶景吕次子叶德澍取得电话联系。

2008年至2009年叶景吕的62幅肖像先后在北京798艺术区大河画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沈阳世界报道摄影节、韩国光州艺术双年展等重大影事活动上展出。

2009至2010年，全冰雪写下了26万字关于叶景吕以照片为核心的研究专著《一站一坐一生——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福建电视台拍摄了专题纪录片《雕刻的容颜》，获得2010年中国纪录片最高奖短片十佳。2011年和2012年，叶景吕肖像还在北京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和澳门艺术博物馆分别举行了个展。2013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在鉴宝栏目中邀请全冰雪及叶林、罗孝逵到现场制作相关节目。

叶景吕安息40年之后，因这本影集影像被世人认识并将他个人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中

国摄影史连为一体。文化让他延年益寿，诚如陈子奋题写的箴言“是寿者相”。

20世纪60年代，我的外公外婆租住在宫巷37号（原19号），隔着35号与叶景吕居住的33号为邻。这三座住宅因地处五代闽国王妃陈金凤寝宫旧址而称“宫苑里”。每当周末节假日，我便来到宫苑里与邻里孩子打乒乓球、玩游戏，度过快乐的少年时光。

在小巷里，我常常会遇到一位住在33号的老人，他常穿着灰蓝色的汉式棉布服装，上衣口袋里常插一支老式钢笔，脚蹬藏青色老布鞋。他略带忧郁的大眼睛，谦和微笑中流露出困境中的自足与祥和，礼貌稳健从容的举止深得邻里敬重。在纷繁的市井社会里，这种超凡脱俗的气质留给少年的我永志不灭的印象。时隔40多年，当我从摄影家曾璜（也曾住宫巷林聪彝故居）手中接过叶景吕影像资料时，我惊讶地认出了这位老前辈。

同是“老三届”知青的刘毅目前正在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海军史。少年时代的他是在集邮过程中认识了晚年的叶景吕。作为老海军后裔的他与罗丰禄的孙辈人物罗孝达是世交，罗孝达带他来到叶景吕在宫巷的大院。进入大厅西侧不大的厢房，咯吱发声的地板，提醒人们小心翼翼、轻踏轻走。那是“文革”前两三年的事，叶老已经80多岁，腿脚已经不便。老人常常是坐在摇椅上微笑着轻声细语地接待这位正在读中学的少年人。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成了忘年交。叶景



年轻时的叶景吕 相片所有权人 全冰雪



老年叶景吕 相片所有权人 全冰雪

吕让刘毅观赏他的两大本邮册。一本是从清末到1949年的邮品，最珍贵的是晚清龙票，一套套完整的邮品排列有序。另一本是从解放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品。这些邮票大多是未经加盖邮戳的新票，品种齐全、保存良好。老人如数家珍地讲述邮品背后的故事、收藏它们时的经历。说这些时他心里总是充满阳光。有时他会将自己重复收藏的邮品慷慨地赠送给少年刘毅。

几经来往，叶老还会搬出他的两本老相簿，大本的是他的家庭影集，小本的是他个人肖像影集，也就是流落旧书市最后被全冰雪收藏并加以整理展示的相册。他向年轻人讲述自己的生平，一张张回忆自己曾经时光、过往的自豪，往事在相片中重新浮现。

这对忘年交有时会携手走出宫巷来到南街中

段的集邮门市部。在社交场合老人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他的外交涵养，低调的绅士派头，有一种远古的贵族遗风。

二

他的时尚儒雅从何而来？刘毅听老人说过，他年轻时曾随外交官罗丰禄出使英国，在伦敦生活了头尾5年，他人生的第一张照片就是1901年离开伦敦前在照相馆拍摄的，那年他虚岁21。

罗孝逵是罗丰禄最小的孙子，是罗孝达的堂弟。20世纪50年代初，罗家有难事要办的时候，学生时代的罗孝逵就由母亲指派去找“叶先生”帮忙。

1903年外交官罗丰禄患鼻咽癌英年早逝。罗

夫人魏氏是马尾船政学堂总工程师魏瀚的妹妹。罗丰禄与魏瀚是同龄加同窗好友，先后入马尾学堂。魏瀚先是将年长的妹妹许配罗丰禄，惜47岁时病逝于英国。后又将另一个妹妹许作罗丰禄的继室。罗夫人用罗家的积蓄购置了仓山爱国路7号洋房住下一个大家庭，再在城里开设三家商店：建盛茶庄、久盛当铺，还有一家食杂铺。这三家店均聘请一个人当掌柜，相当于今天说的总经理，这人便是叶景吕，足见他们之间的信任与忠诚。

少年叶景吕何缘何分能随罗丰禄出使西洋？中年的叶景吕为何在罗家临危之时受此重托？他们间有何超乎寻常的亲缘关系呢？

罗孝逵说：叶景吕的母亲姓罗，出嫁前本是罗家的大丫鬟。

叶家有个祖训，不求功名不在朝廷为官。受此祖训影响，叶景吕的父亲当个传统的手艺人，以织锦为生，40多岁还未“脱光”。

罗家有个大丫鬟，从小到罗家，不识字没文化，也不知道自己身世，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到了婚嫁的年龄，深受西方人文思想影响的罗丰禄夫妇为她选择了老实巴脚的手工业者嫁出。简朴的嫁妆之外让她随罗家姓。孤独的丫鬟成了叶师娘，不仅有了夫家还有了娘家。长子叶景吕从小聪明灵巧。怀着对罗家的感激之情，母亲回娘家的时候都会带上叶景吕，咿呀学步的叶景吕称罗丰禄为舅公。

据罗家人说，叶景吕从小受罗丰禄的喜欢。

在罗家天井下跑来跑去的幼童的笑声给公务繁忙的罗丰禄带去些许的快意。在船政学堂里，罗丰禄的英文口语是超群的，未毕业就被选作英文助教，内定毕业后作为译才使用。他习惯日常使用英语，会与小孩用英语单词作对译游戏，小孩说中文，他会脱口说出英文。这种游戏，叶景吕晚年也与孙辈人这样玩。

1896年12月，罗丰禄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英国同时兼任欧洲英、意、比三国公使。15岁的叶景吕由母亲出面向舅公求情：既然喜欢这孩子，您就带他去英国吧。罗丰禄的确喜欢叶景吕的聪明、稳重、好学。好吧，让他跟去做书童吧。可是外交使团的随员里没有“书童”的名分。叶景吕生前亲口对刘毅说：我是以厨师的名义随团去英国的。

在英国伦敦市中心区的波特兰大街49号，一座古老红砖建筑是当年大清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外交机构，至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大使馆。新老照片对比，房子结构基本一致，只是今天装饰更加庄严华丽，二三层沿街山墙多开了几扇窗户。叶景吕可能并没有在这楼的厨房里工作，而是帮他舅公办理些贴身事务。罗丰禄会在英国采购工业设备：锅炉、发电机、电动机……一些具体事务可能要叶景吕去办理。在英国，叶景吕学会了英国上流社会的标准英语，学会了外交礼仪，学会了商贸业务。他的人生在一个偶然中转折，低概率的幸运落在他的头上。他本是个平凡人，在人生最可塑的时间段里，他远离了福



叶景吕与家人合影

州城乡的烟火，吸纳了另一个世界的人文思想，潜移默化并深入骨髓地奠定了一生优雅的走向。

三

前文说过，叶家有祖训，子孙后代不在清廷为官。所以叶景吕的父亲只能是个织锦匠。叶家的另一条祖训是“叶朱”不通婚。这是为什么？

叶景吕的孙子叶林与我在同一个小区里居住。当仝冰雪寻找景吕相片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的那一天，他家的电话就被打“爆”了。最多最好奇也是他家人最反感不愿听的问题便是：相册为什么会散佚？

叶家本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人，南明王朝唐王朱聿键的后代。

明朝末年，京都的明朝廷灭亡了。第八代唐王朱聿键从凤阳到浙东，从浙东进入福建。在郑

芝龙的拥戴下在福州登基，改年号为隆武，史称隆武帝。隆武亲征闽北兵败闽西，之前为了朱氏血脉的传承延续而令一侄儿改姓叶，在福州民间隐姓埋名地生活。所以才留下上述祖训。

智商超群有着皇家血统的人，不能在主流社会一展风采的叶家后人，大多选择文教、科技、经贸为业。叶景吕被压抑的智慧能量，因随罗丰禄出使英国得到开启，在替罗家掌管经营中得到发挥。他还曾兼任了罗家孙辈的英文教师。业余时间，他用集邮打发时光，用持之以恒 60 多年的照相爱好收藏自己的历史，记录自己的岁月沧桑。可惜他的日记毁于“十年动乱”的大火。他的两册邮品，从解放区到新中国的那册得以完好保存，并在他的孙女处得到继承和补充。从晚清到 1949 年的邮册经动乱大火烧毁残缺不全。

他的两本相片集，收录叶氏大家庭合影的那一本至今下落不明。而他 62 年连续拍摄的 62 幅个人影集，几经辗转有幸被识宝人收藏，由此打开了对他个人乃至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研究话题，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唯一。他个人因此走进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

福州摄影史在中国摄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仅次于香港、澳门，与广州、上海并列全国前茅。叶景吕用他的一站一坐一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摄影史。2015 年 11 月 1 日福州摄影研究会成立，编撰一本福州摄影史，建一座摄影博物馆，用相机记录更多人生的故事和社会的变化，成了摄影人的新目标。

“一六事件”和刘卢之战

李海涛

1930年1月6日，寒风驰骤，夜幕降临。商店早早就打烊，大街上空无一人。福州朱紫坊省府大员陈培锬的宅院内，依然灯火通明，觥筹交错，十余位宾客正在这里喝迎春酒。忽然，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挟着寒风从南街冲进来，三两下便解除了门口两名警察的武装，又旋风般地直扑大厅。大厅八仙桌上端坐着的陈培锬宴请的客人，见这阵势，脸上的表情全都僵住了。陈培锬带着哆嗦声问为首的一位军官：“你们是哪支部队的，是要做什么？”那位军官也不回答，只是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大声念道：“郑宝菁、陈乃元、许显时、程时燧、林知渊、吴澍，念到名字的跟我们走！”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被点了名的几位宾客顿时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

这时，坐在筵席下首的唯一一位着戎装的客人站了起来，悠悠地说：“不为什么。你们不是对我大哥卢兴邦有天大的意见吗？整日骂个不停。可我大哥又听不到。现在，请你们自己到尤溪走一趟，亲自和我大哥理论理论。”

这位戎装的客人，便是卢兴邦的堂弟，也是卢兴邦派驻省府的代表卢兴荣。随着他一挥手，士兵们上前，两人一个架起被念到名字的宾客，又一阵风般地撤离陈府，留下目瞪口呆的陈培锬和一千人。过了好一会儿，陈培锬才想起派人向省府杨树庄主席报告。



杨树庄



卢兴邦

当时，陈乃元因病没有出席陈培锷的迎春酒会。他是在自己家中被强行带走的。

这是民国政府成立以来闻所未闻的绑架大案。被绑架的6人，郑宝菁是福建省府秘书长，陈乃元是民政厅厅长，许显时是建设厅厅长，程时燧是教育厅厅长，林知渊是省府委员，吴澍是水上公安局局长，都是堂堂省府大员。

听到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福建省主席杨树庄急得在院子里来回打转，却束手无策。杨树庄是闽侯人，毕业于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原为北洋海军应瑞舰舰长，1926年，接受北伐军的条件，率舰起义，并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一职。北伐军当时开出的一个条件，即是福建稳定后，把福建省政交由海军支配，按月拨给海军饷银30万两。这年冬天，海军配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入闽，并占领厦门。1927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杨树庄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厅长。杨树庄却

迟迟不敢就职。他知道，虽然如愿当上福建省主席，但海军力量有限。而东路军入闽时，由收编的地方民军组建的新编第一军各部，已成了各地实际上的统治者，杨树庄的政令不出省垣。盘踞在闽北的卢兴邦为新编第二师师长，也是民军中实力最雄厚的一部。卢部占有闽西北20多个县，与省府公然抗礼，但省府对此无可奈何。为了统一省政，树立省府权威，杨树庄决定专门成立一个装备精良的教导团，作为省政府的直属武装力量。这件事，后来成为1930年“一六事件”的导火线之一。

卢兴邦，原名卢良，尤溪县六都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以挑纸为生。因生活穷困，投奔土匪苏艺。后来自立门户，发展成一支数百人的武装队伍，活动在尤溪、大田一带边境。1922年秋，粤军许崇智部入闽，驱走福建督军李厚基时，卢兴邦乘机收缴了驻尤溪县城的北洋军



蒋介石题赠于卢兴邦的牌匾



广豫票

一个炮兵团，声势大振。此后，经历了北洋军队“八路攻尤”的战斗。由于众寡悬殊，卢部主动退出尤溪县城，并化整为零，除一部主力留在尤溪山村外，其余部队辗转于闽北各县。其中，卢部参谋长张秉汉率领的特务团、独立营与由古田土匪收编的钱玉光团会合，流窜于古田、屏南一带。他们熟悉地形，不断偷袭北洋军队，使得向卢部进攻的北洋军队无果而返。而卢兴邦部队则在与北洋军的缠斗中得到战争锻炼，军力不断增强。1926年，北伐军攻入福建时，卢兴邦部队占领南平，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军行列，队伍进一步壮大，由原来的二旅四团，扩充为三旅六团，分驻闽西北各县，掌握政权。卢兴邦自任师长，师部驻南平。第四旅旅长卢兴明，旅部驻建瓯。下辖第七团、第八团，分驻崇安、浦城、建瓯、建阳、松溪、政和等县。第五旅旅长卢兴荣，旅部驻南平。下辖第九团、第十团，分驻邵武、光泽、建宁、泰宁、沙县、永安等县。第六旅旅长

卢新铭，旅部驻长汀。下辖第十一团、十二团，分驻闽西各县。特务营驻尤溪、大田；炮兵营和工兵营驻南平。此外，还有三个由土匪收编的补充团，其中第二补充团钱玉光部驻古田。卢兴邦成了名副其实的“闽北王”。

卢兴邦盘踞闽北后，所有各县田粮、税收以及人事任免都被其控制，各县县长都由卢兴邦委任。卢部还在尤溪口设卡，抽收由闽江运往福州的木排捐、上下水船捐、百货捐等。卢兴邦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印发钞票，叫作“广豫票”。他还将洪山桥造币厂搬回尤溪，制造假银币，强制发行。在他控制下的闽北各县，还公开抽收鸦片捐、赌博捐并开花会，使得闽北地区烟、赌、花会盛行。闽北盛产木材，卢兴邦军队勾结商人，不经地方政府批准，大肆砍伐木材，将盗伐的木材运往福州销售，中饱私囊。

由于卢兴邦还挂着一个省府委员的头衔，他的所作所为，居然还带着一些官方色彩，这让新

成立的福建省政府难以容忍。在省政府的历次会议上，对卢兴邦部的责难不绝于耳。方声涛、吴澍等人更是指斥卢部为“土匪”。这让列席会议的卢兴荣，脸上挂不住，常常因此退席。不久，杨树庄宣布改组省政府，初拟名单中，卢兴邦已不在省府委员之列。紧接着，便是成立教导团，省政府的剑锋直指闽北。但是，卢兴邦在福州的势力仍然很大，他收买了一批政客，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还用重金拉拢负责福州城防的海军陆战队旅长林忠，意图推翻杨树庄政府。

现在，在海军陆战队的眼皮底下，卢部士兵居然明火执杖，进福州市区绑人，而且绑的还是省府6位大员，一路通行无阻地将他们径直押往洪山桥，登上早已停泊在那里的汽船，连夜向上游驶去。省府的脸面荡然无存。

此时海军内部亦矛盾重重。虽然表面上福建全省由海军管理，但除杨树庄出任主席外，海军在省府委员中均无位置，这令他们颇有怨声。尤其是省府成立陆军教导团，让海军陆战队很不舒服。卢兴邦正是利用这一点，积极拉拢海军陆战队。杨树庄也知道林忠和卢兴邦交情不浅。他随即通过林忠向卢兴邦交涉，提出解救人质的方案，要求卢兴邦立即放人，但被卢兴邦一口拒绝。他的回复很干脆：省府必须改组，杨树庄必须下台。

蒋介石闻报，大为震怒。但因此时他正与冯玉祥和阎锡山开战，史称“蒋冯阎大战”，实在无暇他顾，于是他派秘书长张群来闽斡旋，希望此

事和平解决。

2月初，张群乘船来福州，省府派车到台江码头迎接。然而车行半途，即遭枪手伏击。张群的副官中弹当场毙命。后来查明，这是卢部勾结福州帮会头目江秀清所为。而张群因为在后面的车中，侥幸逃过一劫。光天化日之下，在省城大街枪击国府要员，可知当时治安的混乱。张群吓得赶紧离开福州。调解无功而返，蒋介石遂决定武力解决。他下令正在闽西“剿共”的陆军56师刘和鼎部开进漳州，之后，分兵一部，由海路到达福州。1930年6月7日，在人质被绑5个月后，爆发了刘卢之战。

这时，卢兴邦已经在福州外围集结了大量部队，准备攻城。这期间，他派人联络冯玉祥、阎锡山，表示要共同反蒋，希望取得他们的支持，但没有得到回应。

为阻止卢兴邦部进攻福州，刘和鼎先后从闽南调来了两个旅，在西门将军山和北门马鞍山、大北岭、小北岭一带构筑工事，防守福州。

卢兴邦任命卢兴荣为前线指挥官，在白沙镇成立前线指挥部，将部队分左右两路进攻福州城。左路由旅长陈荣标指挥两个团向大北岭、小北岭进攻。右路由卢兴荣亲自指挥两个团，另有贵州军阀刘志群的部队，向将军山防线进攻。卢部还策动帮派首领林寿昌一伙在福州城内放火，扰乱刘师的后方，并扬言，打进福州后准予部队掠夺三天。福州城内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一夜数惊。为防止卢部渗透，刘和鼎部队在进城的道

路上堆起沙袋，架设机关枪，检查来往车辆和路人。还派出佩戴袖章的警备队在大街小巷日夜巡逻。福州城内商家关门，酒店谢客，市面一片萧条。

时值初夏，气候十分炎热。卢兴荣下令部队于拂晓发动进攻。但刘和鼎师以轻重机枪配置的防御阵地十分坚固，火力猛烈。打了一天，左翼的钱玉光团初战不利。钱玉光的部下原都是古田惯匪，从来没有打过阵地战，不善攻坚。加之纪律不严，行动不一致，被刘和鼎部队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只有杨忠贞团在内线的带领下悄然绕过小北岭，迫近新店。因担心孤军深入遭到包围，所以不再前进。而右翼部队由于遇上强大

抵抗，不但寸土未得，还造成大量伤亡。卢兴荣正要调整作战部署，准备新的攻势，不料这时，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这天，钱玉光正在为战事失利苦恼时，收到小妾何玉莲的信，要他速回古田。何玉莲是古田水口人，颇有几分姿色，而且善使双枪，百发百中，人称“水口妹”。钱玉光回到家中，见到民军中的旧相识黄炳荣正坐在堂上。黄炳荣是受省府的委托，专程前来古田做钱玉光的策反工作的。他先说动了何玉莲，让她从前线叫回了钱玉光。何玉莲对钱玉光说：“我们本是土匪，被政府收编成为正规军，得到政府的信任。现在却要向政府开战，这是明明白白的造反，迟早是要掉脑



尤溪卢兴邦故居

袋的。”听了他们的劝说，钱玉光内心已经动摇。

陈荣标听说钱玉光擅离前线，带着几位卫兵也赶到古田。他拿出卢兴邦的手令，严厉斥责钱玉光违抗军令，要他立即赶回前线指挥部队进攻。一言不合，两人起了冲突。陈荣标盛怒之下，手伸向腰部的枪套。可是何玉莲眼快手更快，一个转身，只听“啪”一声响，陈荣标脑袋已经开花。跟来的卫兵见状全都吓得举手投降。

钱玉光打死旅长陈荣标，占据古田，宣布易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省府委任钱玉光为新旅长，收编原卢部官兵。在左翼作战的杨忠贞是陈荣标的表弟，听到噩耗赶紧率军后撤。钱玉光阵前倒戈的消息传来，右翼军心随之动摇。卢部因此全线崩溃。刘和鼎师展开大举反击，卢兴荣指挥部队向樟湖坂、尤溪口节节后退，杨忠贞团则慌不择路地快速向闽北逃窜。因兵力不足，刘和鼎部没有继续追击，两军在樟湖坂形成对峙。

经历了这一仗，卢兴邦的势力大为削弱，兵员锐减，地盘也大大缩小，只剩下沙县、永安、尤溪三县。其他各县均被刘和鼎师和教导团占领。卢部已无力再与省府强硬对抗。于是，国民政府派陈肇英出面调停。蒋介石取消了对卢兴邦的讨伐令，并给予恢复番号。被绑架10个月的6位省府大员也得到释放，只是原民政厅厅长陈乃元已经病死在尤溪。这以后，卢部改编为陆军52师，加入到闽西“剿共”的序列，部队薪饷由南京政府统一发给，每月限45000元。但部队所在地方各项税收统归省政府掌握，卢部不得染指。

盛极一时的卢部气势，从此一蹶不振。

当刘卢战争开始时，卢部旅长卢兴明正在上海住院治疗。蒋介石已下令免去卢兴邦的师长职务，于是叫卢兴明回闽收拾残局，并许以接任师长。卢兴明从上海经浙江返闽，经过龙泉县时，被当地警察检查出身边携带大量鸦片膏，当即加以扣留。由于卢兴明平素生活不太检点，又听说蒋介石对军人吸食鸦片深恶痛绝，处罚极严，一害怕，当晚便吞服了大量鸦片膏自杀，死于龙泉拘留所。

刘卢战争结束后，军委会要整顿卢兴邦部，竟无人可用。这时，蒋介石听从了十九路军师长毛维寿的提议，让卢兴荣接任师长。于是蒋介石特地在南昌行营召见卢兴荣，表示对卢部官兵既往不咎，但要他整肃部队军纪，为国效力。此后卢部参加了讨伐十九路军和围剿红军的一系列战斗，但作战不利，不断损兵折将，经几次整编，兵员已不足万人。不过，随着不断有青年学生加入，这支部队的素质也得到提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浙江龙泉集训的卢部官兵深受全国抗战热潮的影响，群情激昂，抗日杀敌的呼声很高。卢兴荣代表全师官兵专程到南京面谒蒋介石，请求派他们到前方杀敌。蒋介石表示嘉许，将其编入第10集团军，投入上海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在这场极其惨烈的淞沪会战中，卢部官兵奋勇杀敌，以致伤亡殆尽。但这支由民军蜕变而成的抗战队伍，也由此写下悲壮而耐人寻味的一笔。

福州金鱼与传人们

邱泰斌

一

中国是金鱼的故乡。金鱼素有“东方圣鱼”、中国“国鱼”之誉。

金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之一，天然的活生生的艺术品，迄今已有 1700 年左右养殖记载历史。

远在晋朝（265-420）中国已有红色鲫鱼的记录。唐代“放生池”开始出现红黄色鲫鱼，宋代出现金黄色鲫鱼，人们开始用池子养金鱼。到了明代，金鱼搬进鱼盆，所以又称“盆鱼”。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金点有鲤鲫鳅数种，鳅尤难得，独金鲫耐久，前古罕知。”

根据史料和近代科学实验显示，金鱼起源于我国普通的野生鲫鱼，先由银灰色的野生鲫变为红黄色的金鲫，再经过不同时期的家养，由红黄色金鲫逐渐变成不同品种的金鱼。世界各国的金鱼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引种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鱼。福州位于福建母亲河闽

江下游，由于地理环境优越，常年气温在 19 至 21 摄氏度之间，气温适宜，阳光充足，更兼城内水资源丰沛优质，金鱼养殖可谓得天独厚。

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福州府志》卷三十七“食货志”记载：“金鲫能变幻，可蓄盆中，俗称‘盆鱼’。”此志书记载足以佐证，福州金鱼养殖至今不下 400 年历史。

成书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由清福州知府徐景熹主修的《福州府志》记载：钟丘园在杨桥之北，马尚书森别馆。森记：“又攀磴转而上，始为亭，山上最高处也。亭前有药栏，芝兰谷，砌石为池，豢金鱼其中。”卷二十六“物产二”记述：“‘盆鱼’，有三尾，如虾，身赤，尾金。‘盆鱼’中品之佳者，名金箍鱼。”

清末福州植物学家、大学者郭柏苍《闽产录异》卷六“鳞属·盆鱼”则作了详细记载：“‘盆鱼’即金鱼，福州南台银湘浦业此者数十家。俗以蓄于盆中，故呼‘盆鱼’。有岐尾、有四尾、有凤尾、有龙目、有平目，或纯红、或纯白、

或杂红白。惟纯黑者名‘铁青’，纯白者名‘银鱼’，为难得耳。”由此透露，至清时，福州金鱼养殖业已经比较兴盛且成一定规模，仅银湘浦一处就有几十家，可点可圈品种已有不少。特别是旧时福州三坊七巷不乏封疆大吏、豪富巨贾、文人雅士，将美丽的金鱼用以点饰庭院水榭鱼池。

郭柏苍的孙子、民国藏书家郭白阳（1901-1956）《榕城考古略·竹间续话》卷四记载了福州嘉庆年间举人郭介平饲养金鱼

的嗜好，颇为形象风趣：

“撰先荣禄公，讳阶三，字介平，嘉庆（1796-1820）丙子举人，夫子身稍短，目小而光如闪电，少须。暇则闭目静坐，率一二时许不见摇动。爱蓄金鱼，大盆贮水，大者三四寸，游泳上下，暇则观之，他无所好。”

目前福州拥有民间金鱼养殖场五六十家，面积近千亩，品种百多个，产值过亿元。出口至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福州金鱼以品种繁多、体型硕大、色彩鲜艳、品质优良而著称，较具代表性的品种有兰寿、琉金、狮头、望天球、皇冠珍珠、蝶尾、水泡、寿星等。

近年金鱼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

2013年福州被中国渔业协会授名“中国金鱼之都”。福州金鱼一跃成为全球金鱼老大，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2009年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参展的福州金鱼一举获得2金4银

1铜。2010-2011年参加北京举办的金鱼、锦鲤大赛，福州金鱼两年总揽全场总冠军、亚、季军。2012年，福州举

办的世界（福州）金鱼大赛，福州金鱼一举获得全场总计20项冠军中的18项。2015年9月17日在海峡（福州）渔业周暨第十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上，福州金鱼包揽前三甲。

在天津、苏杭、广州、福州四大金鱼产区中，福州精品金鱼名列首位（如“红白兰寿”曾击败上千条优质金鱼，荣膺“中国金鱼皇后”桂冠），并与北京宫廷金鱼、苏杭杭州金鱼并列中国三大金鱼流派。

如今全球最好最美的金鱼出自福州，福州小金鱼正悠悠游向大世界……





邹桓（右二）在金鱼养殖场

二

邹鼎世家，世代养殖金鱼，位于北后街77号“屏麓山庄”的邹家大院历来被誉为“金鱼之宫”。邹鼎（1895-1952，字赉欢），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饲养金鱼已历经40多年，在中国金鱼界颇负盛名。

邹鼎当时饲养的金鱼多为珍品，拥有狮子头、水泡眼、珍珠鳞、望天球、五彩鹅冠、凤尾黑龙睛、鹤顶红、龙凤球、五路红和高头龙睛等。他家最大的金鱼重达0.53公斤，长45厘米。

新中国成立前，欧美喜欢金鱼的人士来榕时，均上门邹家拜访观赏。抗战时期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日本兵曾抢走邹家20余条珍品金鱼。据说运回东京献给天皇玩赏。

随着声名远播，金鱼品种和数量增多，仅靠薪金生活的邹鼎深感经济负担沉重，特别是鱼食（需要鸡蛋、面粉、鱼虫等）力不能支。1950年

初，睿智的邹鼎做出重大决定，将自己长期精心饲养培育的珍贵金鱼几十个品种共计5000条以及几十个优质鱼缸全部无偿捐献给人民政府。

这批金鱼由省人民政府先委托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接收，暂存孔庙（后一度改为少年宫）饲养，后转交养殖展览金鱼历史悠久的福州西湖公园，以供广大市民观赏。

邹鼎及其子邹桓、邹穆等先后被招进福州西湖公园养殖金鱼。邹家父子十分敬业，培育了很多优良的金鱼品种，曾经展出一尾重达1.75斤的“五彩鹅冠”，轰动福州。1952年，57岁的邹鼎壮年早逝。其子邹穆在实践中运用体外受精原理和静水孵化特征，创造了简易的“人工授精法”，使金鱼授精率由原先的40%提高到了95%以上，对定向变异新品种杂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7年福州西湖公园开化寺南侧被扩建为集观赏、饲养为一体的渔场，面积约300平方米，左侧为观赏鱼廊，右侧是饲养场。



汪聿钢（右三）与澳督高斯达合影



游德馨参观金鱼展

邹家子弟就曾在这里养鱼弄展。福州金鱼第二代传人回忆，那时邹穆在开化寺旁的渔场工作。他是个残疾人，拄着双拐，大眼睛，花白发，说话声音洪亮，敬业和蔼，诲人不倦，让人望上一眼就能记忆一辈子。

福州金鱼与传人们与邹鼎世家一起影响和推动福州金鱼养殖的，还有福州银湘浦的金鱼养殖。

福州银湘浦一带是民间金鱼养殖场所，当地村民家门前有许多养殖食用鱼的鱼塘，他们便在自己家后院借助地利，摆放了大量的大水池，用以养殖销售金鱼，补贴家用。20世纪50-60年代鱼湘浦（即原银湘浦仓山范围延伸扩大到台江茶亭街、洋头口一带）共有民间渔场20多家。

那个年代娱乐活动项目较少，养殖价格不贵且外形漂亮的金鱼算是一种民间普及的爱好。不但有钱人有闲人买着养着，少钱人少闲人也迷着买着。孩子们更是情有独钟。他们一有零花钱，就提着用铁丝捆住的空浆糊玻璃瓶，跑去银

（鱼）湘浦买鱼。

当年稚气的孩童如今早已白发苍苍，但他们还清晰记得，那时银（鱼）湘浦有个卖鱼老婆婆，瞎了一只眼睛，大家都叫她“单眼姆”（福州方言）。“单眼姆”的金鱼质量好，大家都向她买很多。

三

1969年，福州市园林系统被撤销解体，金鱼养殖亦事业凋零。一直延续到1972年福州园林机构得到恢复，金鱼养殖才得以复兴。

当年福州园林口引进了一位金鱼传人能手——汪聿钢。

出生于1940年的汪聿钢，天性喜欢小动物，儿时就接触金鱼，时不时跑到银（鱼）湘浦老根据地的地摊上买金鱼。1954年夏天汪聿钢因患肺结核病休学，离开福州一中校园，从此金鱼成了

他病榻前的伴侣，后来参加工作了也未分手，直至“文革”学习班结束返城后被分配到市防治白蚂蚁公司工作。1972年汪聿钢兴致勃勃地跑到市建设部门，自荐要到其系统下属的动物园金鱼池工作。

汪聿钢初到西湖公园时没见多少鱼，金鱼池也就小小一角，二十几口龙缸而已。唯一的一口十几平方米的池子还住着一只海龟。汪聿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终结金鱼池长期以禽蛋和面粉蒸熟作为金鱼饵料的历史，改用金鱼饵料——水蚯蚓。他找到一位退休的放排工人，此人成了福州专业捞水蚯蚓（俗称沟虫、河虫、红虫）第一人。自从改食水蚯蚓，福州园林金鱼便呼呼生长，欣欣向荣，不久，便终结了长期需向民间买金鱼养殖展出的历史，而且做到金鱼自给有余。

此后，汪聿钢开始把金鱼品种引进与培育，列入动物园金鱼养殖的重头戏。汪聿钢发动众手成鱼。1978年秋，一位武汉来的鱼迷兑现品种交换的承诺，送来了6条不及5厘米长瘦小的扬州黑蝶尾，它们竟成了福州蝶尾的始祖。又一次，西湖公园一政工干部回沪探亲，也受托从上海动物园弄到两条7-8厘米长。当时尚属新品种的五花水泡，装在小铝锅里提回来送到福州动物园。20世纪70-80年代，在最简陋的养殖条件下，汪聿钢历时5年成功培育了金鱼新品种——五花望天球与绒球珍珠。

20世纪80年代，福州市领导与有关部门把金鱼当成一个产业发展，开发世界市场，拓展出

口渠道。1979年底，福州动物园金鱼在香港花鸟鱼虫展销会上一展成名，一售而空。

1985、1987年福州金鱼两次在新加坡展出。特别是1985年那次，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中国金鱼第一次在海外展览，盛况空前。该年2月在新加坡文华酒店大宴会厅举办福州金鱼展销会，展销金鱼品种7大类52种、5200多尾。2月19日开幕式上，新加坡李光耀总理的父亲李谨恭慕名莅临参观。展销会前后持续了5天，观众超过14万人。

交通运输的落后，使当时的金鱼出口路途坎坷。第一次发货去香港走铁路，全程56小时，12箱只装2000条12厘米以下的小鱼。那是不计成本的探路。

1981年发往香港长江水族的金鱼改从厦门船运。从福州到厦门码头都赶行夜间车，傍晚理鱼包装，翌晨运到码头。等接到最终落实起锚通知，就赶着金鱼包装换气调整。还要落实最终的件（箱）数供外贸方去报关。一辆2.5吨的车来回就装几箱金鱼和包括司机在内4个人，供货方就汪聿钢一人负责途中处理金鱼的技术性工作。司机只一个，单程连续开车近8小时。

那年榕深直达大巴开通，金鱼成了首运嘉宾。押运的3人坐车头，几箱金鱼放在车尾。车行一夜，凌晨到罗湖关口，卸货下车一看，傻了眼：几箱金鱼，放底下的已被煮成半熟，上层幸存的也没几条能活……

直至20世纪90年代福州空港开通货运后，



2012年在福州首届世界金鱼大赛上叶其昌与英国评委合影



1987年叶其昌在新加坡参加金鱼展销

福州金鱼出口才逐渐步上正轨。

四

1985年间，市园林部门从民间小巷“挖”来了福州金鱼的重要传人叶其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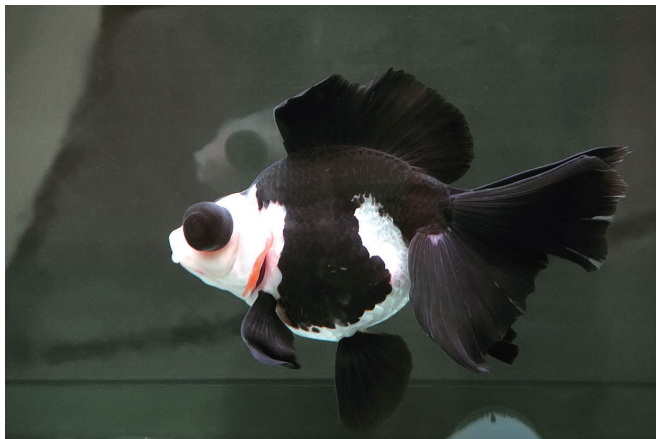
叶其昌，1953年出生于鼓楼区贡院前（现湖东路）一个市民家庭。叶其昌的父亲曾当过国民党县级官员，小时候，叶家兄弟姐妹因父亲的“历史问题”长期抬不起头。家中孩子又多，经济拮据，叶其昌从小就乖巧懂事，学做生意贴补家用。少小时，叶其昌跟着哥哥经常跑洋头口银（鱼）湘浦一带买金鱼养，一角钱三尾，五分钱一尾的。1966年“文革”初期，叶家就已拥有30多口大陶缸、3个各十几平方米水泥地的生产规模了。当时一位国家正式干部一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而叶家卖鱼平日每天可得钱2-5元，

周日一天多时能赚十几元。

时值“文革”，偷着养鱼卖鱼风险很大。曾有红卫兵跑到叶家割“资本主义尾巴”，狠狠地砸了一缸金鱼，但见金鱼那么灵动优雅憨态可掬，便下不了手了，教训一番之后便走人，从此再没返回。

叶其昌对金鱼始终感恩戴德，从小到大到老，上学、上山、上班，一直利用课余、业余时间，持之以恒养殖金鱼，并对每一尾金鱼不论赚不赚钱从不言弃，从不敢亵渎金鱼。

1985年，叶其昌这匹千里马被伯乐相中，如愿以偿调进园林部门，专事金鱼养殖，由业余成专业。他先在西湖动物园渔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到西湖官家村渔场工作。不久便遇到园林系统试行改革承包，叶其昌被当作能人，1988年刚承包西湖官家村，受聘新店渔场负责人，1989年又应要求承包兼任新店琯路渔场场长。



熊猫蝶尾



福寿

叶其昌见证了福州金鱼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奠定了福州传统金鱼培育技艺传人地位，坚持了对福州传统金鱼的守护与创新。

作为大师级领军人物，叶其昌保留了大量优秀的传统金鱼品种。寿星、水泡眼、珍珠、高头、蝶尾是福州金鱼的老五样，由于经济利益驱动，跟风势利，老五样中的一些品种因不赚钱，养的人越来越少。但叶其昌坚贞不渝，始终如一，所有金鱼不管能否赚钱，都舍不得丢弃。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叶其昌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渔场品种最多，不管谁需要引种，他从未拒绝，有求必应。他在金鱼品种交流、创新、养殖技术传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金鱼展评中每每有所斩获，屡屡喜得殊荣，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和推崇，于全球金鱼界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声誉度。

叶其昌十分注重培育福州金鱼新品种、珍品，特别是驯化培育了“福寿”（又称国寿）和

“熊猫蝶尾”。

金鱼养殖培育有两种讲究：人工定向培育（杂交），自然变异。一位金鱼培育者终其一生，能够培育出一尾金鱼珍品已属不易。杂交成功，有的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叶其昌却能在自己的手上培育出了两种以上金鱼新品、珍品！

“福寿”原品种最早是由香港东海水族公司陈镇平先生从日本金鱼拍卖会上带回，交给叶其昌培育繁殖的。据日本水产专家松井佳一所著的《金鱼大鉴》考证，17世纪日本从中国引入金鱼品种，并派人前往中国学习金鱼养殖技术，历经数百年发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日本金鱼。兰寿金鱼成了日本“金鱼之王”。具有敏锐商业头脑的香港客商看上了福州优越的气候、水质等自然条件和精湛的金鱼饲养技艺，看上了叶其昌等金鱼传人奇人，于是便从日本等地带来兰寿等金鱼珍品，交由福州渔场养殖繁育，回购成鱼。

但陈镇平先生带来的第一批日本兰寿并未产



卵。

叶其昌并没有因此灰心气馁，1987年又委托陈先生从日本再带回10多尾兰寿。当时陈先生告诉叶其昌：日本人说了，这鱼离开了日本就不会有第二代了，你试试看。叶其昌不信邪，对新送来的兰寿单独精心照料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88年3月下旬，一尾母鱼成功产卵，孵出了2万多尾小鱼。

叶其昌一鼓作气，精心培育，按照自己的

审美标准，好中选优，努力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兰寿金鱼风格。福州兰寿（后被业界称为“老版国寿”）以其形体雄浑、游姿威武、尾柄粗实、头部肉瘤突出、色彩丰富等鲜明特点面世，与原先日本兰寿已经大不相同。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福寿”培育。

近20年“福寿”深受青睐。1992年福州兰寿在福州金鱼研究会举办的金鱼展中获优胜奖。2003年在福州市园林局和东海水族公司合办的福

州地区首届东海杯金鱼大赛中，叶其昌的黑兰寿获得全场总冠军。2008、2010年第二、三届中国福建花王暨花卉精品展中，叶其昌的红白兰寿、黑兰寿分别获得观赏鱼类最高奖项。2009年在上海北京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上，叶其昌的黑兰寿、五花兰寿获得观赏鱼类金奖。在高档水族市场，品质优良的福州兰寿每尾售价可达6000元；高品质的精品兰寿一尾可卖到2万元人民币以上；倘若得过国际国内大奖或作为镇世之宝的兰寿，有时出价10多万元，主人也未必肯卖。

金鱼“熊猫蝶尾”则是一例成功的变异驯化。

1987年，眼尖心细的老叶发现一群黑白蝶尾金鱼出现了变异现象：有极少量的黑白颜色分明，非常漂亮。老叶万分惊喜，于是特意留下了20多尾黑蝶尾金鱼做种培育。

翌年新产出的金鱼超过20%蜕变为黑白颜色。变异后的金鱼，眼睛、鱼鳍、尾巴是纯黑色的，身上雪白，黑白分明，像极了大熊猫，之后得名“熊猫蝶尾”。

信息时代好事出门快。1989年正月初三，凌晨四五点就有人来渔场敲响叶其昌的门。来人是香港客商兄弟俩，让老叶好歹让几尾“熊猫蝶尾”给他们，让老叶随便开价。老叶喊：“一对250元！”港商二话没说付钱走人。

后来听说这一对“熊猫蝶尾”卖了2万多元港币。虽说在这对“熊猫蝶尾”上少赚了钱，但港客却替叶其昌做了个广告，“熊猫蝶尾”从此声

名大振！

1989年元宵节，“熊猫蝶尾”被第二届福建省花卉盆景博览会评为一等奖。

金鱼养殖露天作业，是个辛苦活儿。当年年过五十的叶其昌和另两位伙伴，每天看管着300口金鱼池，喂鱼、换水，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有时连正月初一也得“泡”在渔场。他习惯于每天凌晨六七点就上班，每年淡季（从年底至翌年3月金鱼产卵期），上午忙上四五个小时，而到了旺季（每年3-5月金鱼孵化、育苗期）繁殖挑选鱼苗，最忙时一天要干上12个小时。夏季挑苗任务更为繁重，一天忙累下来，眼都挑花了，背都直不起来。由于长年累月风吹日晒，昼夜辛劳，叶其昌肤色黝黑，几十年体重一直徘徊在97斤左右，从不上百。近年不养金鱼了，体重才上了130斤。

现在叶其昌虽已退出渔场多年，但很多渔场还保留着他的紫兰花蝶尾、望天球、红头寿星、长尾五花琉金等品种，每当看到这些鱼种，他心中就深感宽慰。

近年从金鱼养殖场退休的叶其昌并未淡出业界。现为省花协观赏鱼专委会副会长、秘书长的他从前台转入后台，由一线领军人物转为幕后顾问评委。2010年10月叶其昌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水族成就奖”；2012年叶其昌被福建省人事劳动厅授予“水生动物饲养（金鱼）一级高级技师”，确立了其“福州传统金鱼培育技艺传承人”的地位。

榕城的鸟与爱鸟人

黄 淦

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福州市的自然条件可以算是得天独厚。不仅四季温暖湿润，而且既有高山又有平原，既有山涧、小溪又有大江、大海，这就为自然万物提供了多样化的优越生长条件。单单那些美丽赛鲜花，歌声似银铃，聪明、活泼又可爱的鸟类，在福州就多达 500 余种，其中市区常见的就有 100 余种。它们自然引起历代福州人的关注。

市区最常见的一种鸟，学名叫鹊鹇。它们形似喜鹊，但比长达 45 厘米的喜鹊小很多。它们长约 25 厘米，浑身黑白相间，并闪烁着深蓝色的金属光泽，十分靓丽，而且活泼可爱又多情，歌声更是动听。它们在福州被称为“情鸟”。

早在数百年前，一首广泛流传的童谣就唱道：“情鸟子，啄坡坡；三岁侬子会唱歌。不是爸奶（爹娘）教奴唱，是奴肚里党党（通通）歌！”

这首童谣里的“情鸟”，在一档福州话电视

节目里曾被说成“金鸟”。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情鸟”（又译“进鸟”）确实是福州地区最著名的笼鸟，而且在我小时候这首童谣还很流行，听到的都是“情”音而不是“金”。还有第二句，我童年时听到的发音是“三岁侬子”，而节目中则说成“三岁孩儿”，众所周知福州人称小孩为侬子或侬子哥，而从不称其为“孩儿”。

其实情鸟不仅是人见人爱的笼鸟，也是喜食害虫的益鸟。“情鸟子，啄坡坡”说的就是它们常在林下坡地啄食虫子。

福州人喜欢饲养的另一种笼鸟叫“黄碧”，学名“暗绿绣眼鸟”。这种漂亮小鸟也十分常见，它们黄胸绿背，体色秀丽，又很是活泼可爱，体长仅 11 厘米。黄碧还常被人误称为“黄莺”。

福建省著名作家郭风在某篇散文中曾写道，



鹊鸂



黑嘴端凤头燕鸥



卷羽鹈鹕



暗绿绣眼鸟，即黄碧

他在福州市区路边绿化树上见到几十只黄莺，还注明是真的见到。但黄莺体长 26 厘米，通体几乎黄色，只有枕部黑色，迁徙季节偶尔有几只路过福州，也是栖息于公园高树顶，一般人很难见到，根本不可能在路边绿化树上见到几十只的大群。显然郭老是把黄碧当成黄莺了。黄碧在春夏繁殖期成对活动，秋冬季天凉了，它们就集成 30-50 只的大群游荡活动，有点抱团取暖的意思。郭风先生可能就在这时候看到大群的黄碧。

11 岁那年我曾饲养过一对黄碧。这种鸟虽然在野外是吃花果和虫子，但在饲养状态下几乎什么都能吃，稀饭、炒面粉、肉松、橘子、苹果、猪油糕，都吃得津津有味。它们还特别喜欢吃蛋糕。因此我妈分给我的蛋糕我总舍不得吃，而要留给黄碧。每当我走近放蛋糕的地方，它们就会发出十分激动的尖叫声，令人油然而生怜爱之心。显然它们早就意识到我要拿蛋糕喂它们。偶尔我会打开鸟笼的门，放它们出来，可是它们总



白眉山鹧鸪



黑脸琵鹭



勺嘴鹬



东方角鸮



凤头麦鸡



天鹅



白鹭

是很快就回到鸟笼里，可见它们已经把鸟笼当作自己的小安乐窝。可惜有一次，我去外婆家玩了两天，走的时候匆匆忙忙忘记给它们的饲料罐添食，结果第二天下午回来时，发现它们已经双双饿死在鸟笼里。为此，我哭了整整两天。

福州著名笼鸟中，还有教了会说话的八哥，娇小美丽形似美洲蜂鸟且善悬停空中的叉尾太阳鸟……

在福州市的森林中，生活着各种鸟类。

神秘的红头咬鹃胸部猩红，体大如鸽子，十分美丽。总藏匿在密林深处，偶尔从林中空地穿过，在阳光照射下，像一团飘过的火球，神秘美丽得令人心跳。

白眉山鹧鸪是一种珍稀的雉鸡类，体色五彩缤纷。观鸟者常说一雉等于十鸟，因为它们本来数量就少，又只活动于密林下层，所以十分罕见。

白鹭上体洁白，脸部鲜红，美丽无比，体型硕大的公鸟最有魅力。

东方角鸮是一种小型猫头鹰，仅一个拳头大小。大头短尾，萌态百出。曾在树林见到东方角鸮强占啄木鸟的树洞巢，并且每天准时来到洞口亮相表演各种萌态。

在闽江口三角洲，有更多的珍稀鸟类让人惊喜连连。

黑嘴端凤头燕鸥是一种形似燕子的海鸥，全球仅 50 余只。闽江口是它们的最主要栖息地，繁殖期它们每天往返于台湾马祖的巢地和闽江口觅食地之间，仿佛是海峡两岸之间的友好使者。

黑脸琵鹭，这是一种嘴巴似琵琶，体长达 76 厘米的大型鹭鸟。体型庞大，体色洁白，嘴巴奇特。可能全球数量不足 1000 只。此鸟在闽江口最多时可达 100 只。

嘴巴似勺子的小鸟勺嘴鹬，体长仅 15 厘米，娇小可爱。因其嘴巴奇特，行动较笨拙，在自然界容易受伤害，所以数量稀少。

天鹅的高雅洁白且庞大的体型显然特别引人注目，难能可贵的是每年闽江口都会有几十只小天鹅造访。

鹈鹕大瓢子式的巨嘴可能大家都知道，这种珍稀大鸟因此特别引人注目。闽江口也是卷羽鹈鹕经常光顾的地方。

凤头麦鸡，有凤凰式的冠羽，身上五彩斑斓，很是奇特漂亮，栖息于闽江口的田野里……

鸟类如此多娇，招引无数观鸟、爱鸟人士的观赏与探索。

福州古代观鸟探索者留下的痕迹已不清晰，

那首“情鸟子”的作者也几乎无从考察。近代最早在福州地区观鸟、收集鸟类标本并写出鸟种记录论文在国际刊物发表的却是 19 世纪初来福州传教的西方人士如法国大卫神父等人。他们和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华莱士是同一时代的科学探索者。英国人拉土奇结识了当时最擅长在闽江上捕鱼猎鸟的唐氏家族，不仅大量收购唐家人打到的珍稀野鸟，且指导他们制作标本，使唐氏家族代代相传，成为中国著名的“标本世家”。

20 世纪 20-30 年代，许多年轻人前往西方留学，福州青年郑作新就选择了到美国学习鸟类学。学成回国后他回到福建省协和大学任教，为调查鸟类足迹踏遍福州郊区的山川田野。抗日战争时期，协大一度搬到邵武，郑作新仍坚持调查鸟类，并携同唐家人多次进入武夷山核心地带深入探寻。大量的鸟类学论文在各权威刊物上相继发表，郑作新成为世界上鸟类学方面的权威人士。新中国成立后，郑作新调到北京中科院动物所工作。

“文革”时期，学校不上课，许多青少年整天到处野玩。这期间不少人学会了用弹弓打鸟，爬树掏鸟窝，关注且爱护鸟类的少年就很少。起初，我也和那些淘气的孩子一样，虽然十分喜欢那些活泼可爱的小鸟，却也会去掏鸟窝，捉小鸟。直到 1967 年夏天，我意外得到一本苏联作家维一比安基的《少年哥伦布》。书中作者用轻快的笔触，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生动有趣地介绍了森林中许多鸟兽的生活习性以及它们对森林的

益处，让我深受启发并引起共鸣。少年哥伦布，就是要像发现美洲大陆的探险家哥伦布那样做大自然的探索者。我特别欣赏结尾的小诗：

森林里的少年哥伦布，
有着敏锐的眼睛和耳朵。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从飞禽到苍蝇都是童话和秘密。

这两行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增强了我探索大自然生物世界的好奇心，激发我写出《鸟类鸣声之谜》《鸟类羽色的奥秘》《森林鸟类是怎样避免竞争的》等文章。此书中强烈的爱护大自然、爱护森林、爱护鸟兽的生态保护意识，也深深撼动我心。从此我不再乱掏鸟窝捉小鸟，而是呼吁大家爱鸟护鸟。

20世纪70-90年代，在福建省以至全国，除了一些大学生物学教师从本职工作的角度来研究鸟，业余的观鸟爱好者极少。以至于我在近20年周游中国的观鸟旅途中，几乎从未见过兴趣相同者。

1990年5月，我在鼓山观察鸟类繁殖期行为时，遇到的第一位持望远镜的观鸟爱好者，是一个来自遥远北欧的瑞典人。1995年夏我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观鸟时遇到的第二名观鸟者是一个法国人。1999年，我到青海湖观鸟，才第一次遇到一伙架单筒望远镜、装备齐全的中国观鸟人，他们来自香港鸟会。直到2006年11月，我骑车到闽江口观鸟，才遇到福建省观鸟会杨金会长及老等、老唐、夏至、泥娃、楼兰等人。从此，找到

了福建省自己的观鸟组织。在鸟会中，可以互通信息，互相切磋，观鸟水平进步很快。

福建省观鸟会在杨金、张浩等人的发起下，成立于2004年。目前，福建省观鸟会成员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并涌现出浮光、WPT、原生态、雪泉、老等、北红、老欧、老兵、水木、CYC2001等众多骨干，同时各分支部门也兴旺发达起来。除上述骨干外，生态摄影部还有斑马、小白、福建柏等版主，并拥有一大批摄影发烧友；公益部有福州晴、戴菊、小麻雀等版主骨干和一大批热心人士；植物组也有闲云老师、天南星、桥等版主骨干和大批植物爱好者。

随着鸟会的兴旺，福州一大批鸟种新记录不断被发现，如白眉山鹳、黄脚三趾鹑、蓝胸鹑、小田鸡、红胸田鸡、普通秧鸡、黑冠鵝、紫背苇鹑、钩嘴林鹑、日本歌鹑、橙头地鹑、白眉地鹑、黑胸鹑、黑喉噪眉、方尾鹑、小仙鹑、棕腹大仙鹑、海南蓝仙鹑、蓝歌鹑、白喉矶鹑、紫寿带、金眶鹑、栗头鹑、蓝喉太阳鸟……

展望鸟会未来，也是人才辈出前途一片光明。钟情于观鸟爱鸟的10来岁小鸟人就有小鸽、小翠翠、小云雀、黑翅鸢、喜洋洋、世界首富、小伯劳等三五十人。小鸽甚至走向世界，受邀到加拿大观鸟。小翠翠则用生动诙谐的语言写成一篇篇观鸟散文，并编成书出版了。而“世界首富”则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台高质量单反长焦相机，经常带上它到全国各地观鸟，死心踏地迷上了观鸟。

家脉

禾 源

家门前的那棵树，不停地落叶，每天总有数片叶子飘到阳台。拾一片，轻轻托在手上，绿色随水分褪去，叶脉如我女儿小时画的一笔笔。叶脉、体脉、家脉只有连体连根，源远流长，才能沐天光吸地气，活在天地间，一旦断根离体，将如这飘落的叶子，渐渐枯萎。

打小起，我就从长辈们讲述的一个个故事中，隐隐约约知道自己的家脉。从浙江景宁而来，先居于龙漈境，后又迁到洋头寨。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繁华富贵，也不知道山野与大庄的区别，每天粗粮填饱肚子，听听七叔公的故事，过得相当快乐。到了十来岁，会结伙打着手电到祖居地漈下村看电影看戏，才发现这个村比自己村子大，有桥有亭有戏台，还常放电影。开始觉得自己村子的小，但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漈下村一些年纪相仿的孩子，会来欺负我们，可我不

怕，总觉得这村子的一切我都有份，像在自己村一样跟他们过招。漈下村的大人见了，总是一句：“都是自家人，不能欺负洋头寨的人。”感觉有着姓氏的福荫，怪不得家里的长辈常会唠叨着姓氏的亲缘。

时光一天天地行走，在拉长我身影的同时，也把我的骨架拉大，这时乡村成了记忆的原乡，成了人们提起我姓氏时，连根提起的一块土。

提起我的姓氏，许多人总要多问一次，而后道出，你这甘氏是少数民族吗？我很少因为这事责怪他们，只体会到这姓氏在当下不足以家喻户晓，就连人数总量也少得可怜，哪能怪别人呢？可我在炎黄子孙寻根拜祖之地的河南新郑，居然生气重责那里的管理人员。我与各个姓氏游客们一样，燃起香，寻找甘氏始祖的香炉，却一直找不到始祖的灵位。招来服务生，她左寻右找，一

样也找不到。我生气了，便说：“夏朝时，有诸侯国甘国，商朝时甘盘为相，春秋战国，还有12岁为相的甘罗，就到清朝，我故乡还有官居提督的戍台名将甘国宝。你们居然将这样的一个忠君报国的大姓氏给丢了。”服务生是个小姑娘，大概被我的愤慨炸晕了，呆呆站在我面前，憋不出半句话。

回到车上，坐在身旁的朋友说：“平日里，你是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怎么今天就得理不饶人了？那情形真有点吓人。”“哈哈，不就是怕你们说，我是从树头洞里钻出来的。”

我感性，本不喜欢思想，但闲下来时，又总会想些事。想村子，想家脉。《说文解字》中有这么一段记述：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凡甘之属皆从甘。”可见，甘姓来源于职业。甘姓祖先是上古巫师，以占卜为业，所以说出来的

话都是“道”。黄帝战胜炎帝、蚩尤，一统天下后，利用上天赐予的宝鼎，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作干支；以占卜用的蓍草推算历法，预知节气日辰；按照节气教导百姓播种百谷草木，驯养鸟兽鱼虫。黄帝将掌管天文历法占卜这一重大事务交给第13个儿子，并封他在甘。后来子孙繁衍，以国为姓，是为甘姓祖先，研究天文历法占卜事。

漈下开基祖，自浙江迁出。据家谱记载，是因替朝廷征收的矿银失窃，变卖家产赔偿，破产而迁徙。我大胆推理，此境中逃亡，大概还顶着不可赦免的灭门之罪。大概先祖想着根脉不可绝，因此一路择荒而逃，越偏僻越好，远离官府，远离官道。先祖在甘氏祖训中还重重写下“勿近官胥”的一笔。先祖识天机，深明四季轮换，岁月更序，一切都有变数，只要根脉在，逢



春重发，依然枝繁叶茂。当然这只是我不肖的猜测，历史已过去，我这一个山野个侏儒（小孩子）哪知十八代前的事？更何况先祖到濠下肇基到我就已21代，历时近600年。可我看到许多甘氏聚族而居的村子，确实都在僻壤处，就如浙江的半路村、福建的罗源甘厝、屏南濠下，都是在大山合围的小山坳里。一些本姓叔、兄也会问为什么我们甘家的每个村子总是安在山旮旯。对于他们的疑问，我抿嘴笑着，得意自己的猜测。后来我读了更多关于甘氏家脉的渊源时，感觉自己的猜测是一个彻头彻尾逃避立论的瞎猜。难道就不可能是祖上有厌世归隐的心态使然吗？太上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智算历法，神能占卜。有书记载：“甘德，战国时楚国人（一说是齐国人），中国著名天文学家。经过长期的天象观测，甘德与石申各自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把这两部著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



这样察天地、明世理的人的后裔，能不洞察人生吗？远离尘嚣，过自给自足的安宁生活，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在一块块世外桃源地，安身立命也完全合乎情理。

浙江庆元县半路村宗祠重修之际，屏南甘国宝研究会一拨人前去考察。我感觉这时期选得好。从前就听说过，这个村收藏有甘国宝会试时的会魁匾额和一枚甘国宝铁印。也曾有人访问过，可收藏者不轻易让人看，那些无功而返的感叹我曾听过。可今天是宗祠落成，敬宗敬祖，来的人血脉里流淌着同样的家脉之水，同风雨，共荣辱，还有什么不能分享呢？

山阻水隔一路相牵，当年迁徙的遥遥征途，如今只有4个小时的车程，我们6点半从屏南出发，10点多就到了庆元半路村。想想这现代化时代，闪都来不及，哪还有可躲之处。若为避难，灾难的速度比迁徙的脚步快多了。我窃窃笑了，

要是明代有了现代化，还有我吗？

握手之礼我行了几十年，感受过不同肤质、不同热度，行于礼，止于礼。然而今天与宗亲的手相握，感觉是两只手的重叠，是一种力量的加持，血脉里的血液在添加，浑身温暖。寒暄的话语虽有地域的差异，但感觉是两股溪水的汇合，同一个基调两个声部在合唱。拜过宗亲先祖，共同沐浴会魁之光，掂量过甘国宝铁印的分量，大家聚首翻阅家谱。此时我感觉甘氏曾孙们如一群小仔，一同拱向“家”这个伟大母亲硕大的乳房，唧唧唧唧地吮吸着乳汁。

我有吸足喝饱的感觉。抬起头，我打了饱嗝，静静地退到旁边，重温起半路村管护家谱的那位宗亲的庄重神情，他抱出家谱一路叨唠，意思不外乎这家谱不可轻举妄动，不是甘氏子孙不能翻阅。直到村委会要翻阅时，他面对那发黄麻布包捆的家谱深深鞠躬，口中念念有词，抬起头大声说：“不好意思，我发过咒，若在座有不姓甘的请到楼上喝茶。”他的那双手，在此时不再灵活，那根捆绑的丝线，他一直解不开，四周目光聚在他的那双手上，我感觉那手会被灼伤。解开了，那布绘有图案，写有文字。布并不太旧，只是民国时期的布，一层又一层地包裹，流淌在纸上的家脉仿佛脆弱成襁褓中婴儿。好啊，婴儿虽然脆弱，但最有生机，婴儿的哭声、笑声都是生命中最动人的成长之声。家脉如婴，生机勃勃，福佑自然绵长。甘国宝中进士，当提督，官居一品之位，是家族树粗壮的一枝，就这样的“粗枝



瀑下风景

大叶”依旧抱守家脉大树，赠会魁匾额，给宗亲一片绿荫。叶落归根就是这家脉的魅力。

一片绿野中，挺立的大树最引人关注，如这块绿地上的一面旗帜，可那些零星小花更加迷人，把草地点缀得无比生动。家脉行走的大地自然有庄稼、树林、花草，家脉行走的村庄自然有三十六行，有俊男、靓女。甘氏先祖题过一对联，这样写的：“一飘风外树，双履雨中山。”我想可以这么理解，不管风外风内之树，都是家脉延伸拓展的风景。也因为这风外风中之树相互呼应，才让树木成林。

“望出渤海，源自甘国。”古脉幽幽，新叶翠绿，守住家脉，留得本分，家脉永有生机。

苦乐年华话蓑衣

陈曼远

一

一件直径约4米长的大蓑衣，像蝴蝶标本一样被钉在正厅的墙上，一下子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在屏南濠头的耕读博物馆里，陈列的旧时农具不下百种，馆主张书岩却对这蓑衣情有独钟，刻意放大了比例去新制了这一件，让它与同样尺寸的斗笠一起，成为耕读文物的特写镜头。仔细琢磨一下，觉得他这么做也不无道理。蓑衣，古代称蓑。《诗经·小雅·无羊》里就有“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可见蓑衣的历史已相当悠久。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本就是一部农耕史，而蓑衣便是农耕文明时期一种古老的雨具。

老宅偏舍的农耕馆里，几件沾满粉尘的旧蓑衣有些年头了，它们理所当然地被放置于斗笠与锄头的附近。蓑衣，是用一种不容易腐烂的蓑草编织的，蓑衣的名字由此而来，后来人们用棕

片替代了蓑草，今天我们见到的很多蓑衣是棕做的，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棕衣。唐代张志和在《渔歌子》里写的句子“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塑造的是渔翁的形象，写的是渔家生活的情趣。而我一看见它，眼前就会有一幅画面：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赶着水牛在风雨中犁田整地，他像是唐宋诗词里走来的老农，更像是我从未见过面的祖父。

二

我的父亲是农民的儿子。父亲读书生涯的最后几年，恰逢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正是国家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物质生活最匮乏的时代。当时农村生活困苦的程度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一个七口人的家里，饥饿常常威胁着正在长身体阶段的父亲和姑姑们。在这样的情



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馆长张书岩



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

形之下，祖父还是坚持不让父亲放弃读书，决意让他把书读完。祖父怕孩子因为帮助干农活而分心，狠心将父亲远远地送到看不见家人的地方，一个要走两个多小时的中学，然后是要乘班车再换火车才能到达的另一个城市。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啊，一个那么需要劳力的农家，祖父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地扛下了所有的生活重担。

1956年，村里的合作社开始后，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家里的劳力少，吃饭的人又多，为多挣一点工分，祖父把自己一人当作两人用，出的全是得工分最多的“十成劳力”，不论天晴下雨，总是早出晚归。在闹饥荒开始的1959年，许多村民到地里捡前一年未收干净的地瓜来吃，由于农具基本上都交给了当时属于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只能用手或借助木棍来刨挖这些冻坏了的地瓜，或者等到下大雨过后，那些深埋于土中的地瓜才会被冲出地面。为了能多捡到一些

地瓜给孩子们充饥，祖父常常没等到雨停就出去了。当孩子们围着身披蓑衣从雨里回来的祖父，抢着要地瓜吃的时候，他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在中学读书的父亲，每月能够得到学校两斤白面的补贴。他舍不得独享，常常把这两斤白面兑换成12个馒头，周末走两个小时的路送回到家里，让父母和妹妹们享用。

1964年的暑假与往年没有不同，但对父亲来说一定是他一生中最沉重的假期。这一年，他从南平师范毕业，欣喜地认为终于可以为他的父亲减轻一点担子，却没想到在学成归来的前一个月，我的祖父就已经离世。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起那个夏天，说起祖母封锁的消息里那场暴雨和洪水，说起祖父在风雨里披着蓑衣的背影，说起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

世间万物皆有兴衰，20世纪70年代化纤产品的出现，使得雨衣和雨伞的使用开始变得普



馆内蓑衣



馆内稻谷印模

及。到我读小学的时候，在雨天，70后的我们姐弟已经可以撑着雨伞去上学了，乡村里的农民们也开始穿着雨衣去田里干活，蓑衣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乡下老家的旧房子已久无人居，祖父留下的蓑衣，被整齐地挂在老屋的土墙上。它长长的棕毛摸起来粗糙又暖和，曾经浸透过祖父的汗水以及50年前之雨水的蓑衣，像一本久置的线装书，发黄的扉页里，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代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的记忆。

三

风和日丽的3月，我曾带孩子去溧头的耕读馆参观。对于出生于2000年以后的孩子们来说，蓑衣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物。听了馆主的介绍，孩子发现眼前这些奇特的“裙子”，确实确实可以与学过的唐诗联系起来，兴奋地背出《江雪》里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情不自

禁地夸古代人好聪明。而当我对他讲起我的祖父时，他说，“妈妈，你的爷爷真伟大”。初听时，觉得孩子尚小，用“伟大”一词来表达对亲人的敬佩不够恰当。但仔细想一想，又觉得用这个词也未尝不可。

父爱如山，无言又深远。在那样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里，祖父始终用坚韧的臂膀护佑着我的父亲走完读书之路。而在那种艰苦的岁月，天下又有多少这样伟大的父亲？他们身披一袭蓑衣，蓑衣之外，是风雨飘摇的世界，蓑衣之下的双肩，坚强地扛着一家的生计，熬过岁岁年年。

如今，在有雨的天空之下，已看不见蓑衣，五颜六色的雨衣和雨伞充满了下雨的世界。蓑衣为一家人遮风蔽雨的年代过去了，墙上的蓑衣成为我们对一个时代、一些人的追忆和怀念。当人们在游玩时再看到蓑衣，一时心血来潮，或许会拿一件来披一披，体验一下穿这种原生态物件的感觉。但那纯粹是一种意趣，与遮风挡雨无关了。

檀木盒里的光阴

陈巧珠

屏南县濑头村，我去时正雨墨成烟。徜徉在青砖灰瓦的小巷，行走于光滑的青石小路，两旁古老的房子，飞檐翘角，细雨斜飞，斑驳的墙面，留下了岁月的沧桑。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就在村子中央，那扇门经过风雨的洗礼，已露出原木色，门环惹铜绿。伸手推开厚重的历史，进门的刹那，周遭氤氲着一股幽幽的檀香与淡淡的墨香。

如果说濑头村是一个古朴典雅的檀香木大盒子，那么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就是这大盒中的小盒子，博物馆内数以万件的展品，则是千百年来历史留下的精美物件。从汉代到近代，从皇帝圣旨和钦赐匾额，到百姓日常生活用品，林林总总，美不胜收。站在古老的庭院中，看庭前青苔墨绿，飞燕绕梁。一张古朴的方桌，桌上的陶壶热气升腾，散发出屏南青草特有的味道。一株青草，一朵小花，经过暴晒，生命就此凝固。在沸

水温暖的冲抚下，怒放更胜于生时，丰厚的叶子与花瓣踮踮起舞，细嫩的花蕊，闪耀着生命的瑰丽。悬壶注杯，泛出淡淡的黄绿色，香艳诱人，就像这眼前的私人博物馆，是一部凝固的历史。博物馆的创始人——张书岩先生，用毕生的心血，让历史注入新的生命之源。触摸岁月停留过的纹路，我分明感觉到千百年来文化之泉生生不息地流淌，随一个个木盒子的打开，诗书、礼仪，花容、女德，一一呈现，那一个“我”也随之从旧日的光阴中缓缓走来。

民以食为天，是天道，是生机。那精美的檀香木食盒，平日里，母亲总是拿出细心擦拭，木色纹理透亮，发出诱人的光。重要的节日，母亲带着我，手提食盒，装些糕点、美食，走亲访友，以礼相送，联络情感。村庄的宁静和美，都装在这一盒之中，多少的磕磕碰碰也融化在轻而严密的“礼”中。家里还有一个小的食盒，对于

年幼的我来说充满了诱惑，共四层，虽然每一层都非常浅，却盛满了热情与亲情，里面放着几块糕点、些许糖果、焙酥的花生、蚕豆。食盒平日里都放在隐秘的地方，或者用挂钩挂得很高，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可望而不可及。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才将食盒拿出，泡一壶热气腾腾的茶，一边剥着蚕豆、花生，一边与亲朋好友们家长里短。我则在一旁与年龄相仿的小姐妹们玩耍嬉笑，那快乐、温馨的时光，历历在目。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拿出了食盒，我嘴馋了，忍不住伸手多抓了几粒糖果，母亲微笑地招呼着客人，目光掠过食盒时瞟了我一眼，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很不情愿地把手缩了回去。客人走时，看着母亲送客人到门口，我赶紧抓了几粒糖果往衣服口袋一塞，一溜小跑出了家门，进了邻居家，叫上小姐妹，手牵着手就往村边而

去。躺在林中青草地上，眯着眼看着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云卷云舒，悠闲、惬意。不远处，一座古老的水车不停地旋转，伴随着流水哗哗的声音，几头牛正蹒跚前行。夕阳还未落山，我们吃完了糖果，舔着嘴角的余香，久久回味。

雨是匆匆的行者，阳光如淡抹的女子，透过雕刻精美的木窗，映照在古老的梳妆盒上。天然的木质纹理，细腻而清晰，檀香悠远。打开梳妆盒，照见的是自己的素面，照见的是少女的情怀，那情怀如花、如梦。女为悦己者容，端坐于梳妆台前，略施粉黛，手执眉笔，低头对镜轻描，点绛唇，于临水静居的窗前翘首凝望，静静地等待一场幽幽的檀香。

梳妆台容己悦人，端庄出场，这是礼、是气、是仪态结缘。那方小小的首饰盒，打开时满眼珠光宝气，难免有几分俗，但佛靠金妆，人靠



妆容，风雅在于点缀，气场来自庄重，小小的檀木首饰盒蓄满万般风情。在旧光阴里，我身穿蓝衫，绾发髻，与夫君相敬如宾。平日里把爱的信物一一收藏，只有忙好了一天的家务，才在夜深人静时，听着儿女们沉沉香睡的呼吸声，静坐于梳妆台前，回忆起少女时期的美好往事，打开首饰盒，拿出首饰，一件一件静静欣赏。时逢节庆，开盒配饰，斜插头钗，找回衣袂翩然、仪态万千、步则摇之的优美。

春花秋月，世事轮回，镜子映照出女儿的豆蔻年华。我的梳妆盒、首饰盒，在她眼里是神秘的，也是她向往与倾心的，有时看见她躲在闺房，偷偷学着我的样子画着、涂着。时光如白驹过隙，岁月更迭，待到她出嫁，我拿出心爱的首饰，一代一代传承。待自己年老，儿孙满堂，再将传家宝嘱托赠予他们，传家风，传诗心，代代不息。想到斯，念到斯，幸福无边，一盒尽收。

我从旧日的光阴中走出来，隔着岁月的两端，静静阅读，读懂了沧桑，亦读懂了耕读文化。文化，佛门说的是禅，道家说的是气，儒家说的是礼。我们的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仿佛简简单单，然而就在简单中一代又一代传承着“道、儒、释”的文化基因。顺着博物馆骨髓之道，窥见前人的生活片段，感受前人的审美情趣，几百年时光流逝，那檀木盒子的雍容与华贵依然如此地清晰与灵动。走出博物馆，看到几个老婆婆坐在村口，双手捂着火笼，晒着太阳，说笑着，或许她们也在回忆



滌头风景

着儿时美好的生活、年轻时幸福的岁月，那面容凝聚着安乐与慈祥。走出村口，不经意的回眸中，感觉岁月荒芜了时光的隧道，荒芜了头顶的屋檐，荒芜了庭前的青苔，却无法荒芜耕读文化博物馆的传承。

滌头村，那个大大的檀木盒子，千百年来飘着古韵，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向我们述说着旧日光阴里的故事。耕读文化博物馆，那小小的檀木盒，装着“礼、仪、容”，装下了千古不息的文脉，飘着墨香与檀香，芬芳永恒。

坚守与创新

——陈朱书法艺术管窥

赵玉林

陈朱先生是我在书法界中所钦佩者之一。我觉得他那朴实、浑厚的书风在今天应该特别予以赞赏和提倡。

凡看过陈朱书法的人，都非常认同其艺术特点：一是他书法构成的线条十分坚挺；二是每个字的间架结构非常紧密；三是作品的整体布白无比均匀。这三点看似容易，要不折不扣地做到，绝非易事。我从2013年福建省博物院举办的《文心荷境》艺术展中，真切地感到陈朱的书法温润圆纯，有“二王”遗意，尤难在虽落墨千数百言，能一笔不苟，精诚专至，直如十里荷塘，万株亭立，清姿可掬，雅韵毕集。许怀中先生在《文心荷境序》中说：“陈朱坚持传统，又处理好传承与创新关系，从唐人楷书入手，临摹不少书法家如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名帖，后又迷

上‘二王’行书。他深刻体会到书法既要扎根传统，也要力求创新，从而逐渐形成其清俊古雅之书风。”此论极为公允。

书道振兴以来，群起纷追，敬重传统，初不待言。但当代也有急功近利者以传统要求过严，按部就班必僵硬枯槁，乃盲目追求“生动”，根基太浅，遂见怪诞不经，甚至引西方美术观点，以改造中华书法。书法界互相观望，社会鉴赏力薄弱，良莠不分，劣货充斥，言之可叹！今有陈朱者，坚守书法传统，身体力行，岂不应赞赏？

至于创新之说，人多误解。书体五种：篆、隶、楷、行、草，已属定型，各体形成，有其历史因由，既能实用又可鉴赏。文字之生，文化赖以传承，我国书法与史并传，在实用与鉴赏之外，更有其重要使命，乃我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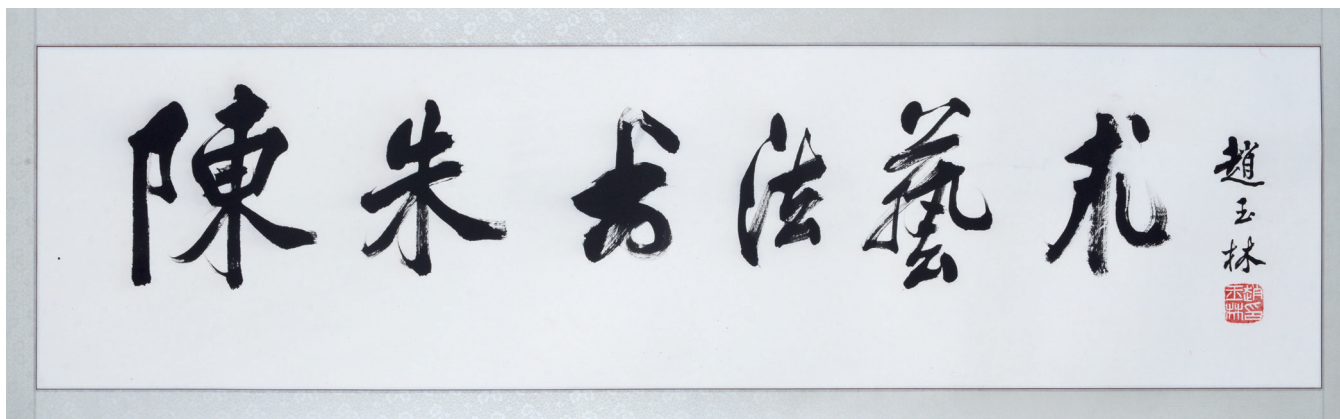
托也。古之书法家皆须具有“智周万物，道济天下”的襟抱。为达到这一伟大心愿，先须正心诚意、以书养学，严格磨炼自己，努力为人民创作表达民族精神的作品，他们的艺术成就就是传承与创新的成果。吾闽近、现代书家甚多。清末的陈宝琛是个书家，其书法取法欧（阳询）柳（公权），创造了冷峻、劲道的书风，其书作在福州各名胜古迹都可见到。西禅寺三门亭联“碧涧生潮朝自暮，青山如画古犹今”即其手笔，人称“伯潜体”（伯潜是其号），似此就可算是创新。前辈潘主兰、沈觐寿、朱棠溪、王希尧等人也可

以说各有创新。现陈朱书法也取法欧、柳及“二王”笔意，形成清俊古雅之书风，在创新之路上走出可喜一步。近日陈朱先生邀我鉴赏其新作《道德经》。长卷五千余言，豪情似海，字字珠玑，卷长二十余米，可谓历来书展中所难得见到者。

祝愿陈朱先生书法艺术在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取得更为丰硕之成果！

赵玉林写于乙未仲秋

时年百岁



赵玉林题字

陈朱 书法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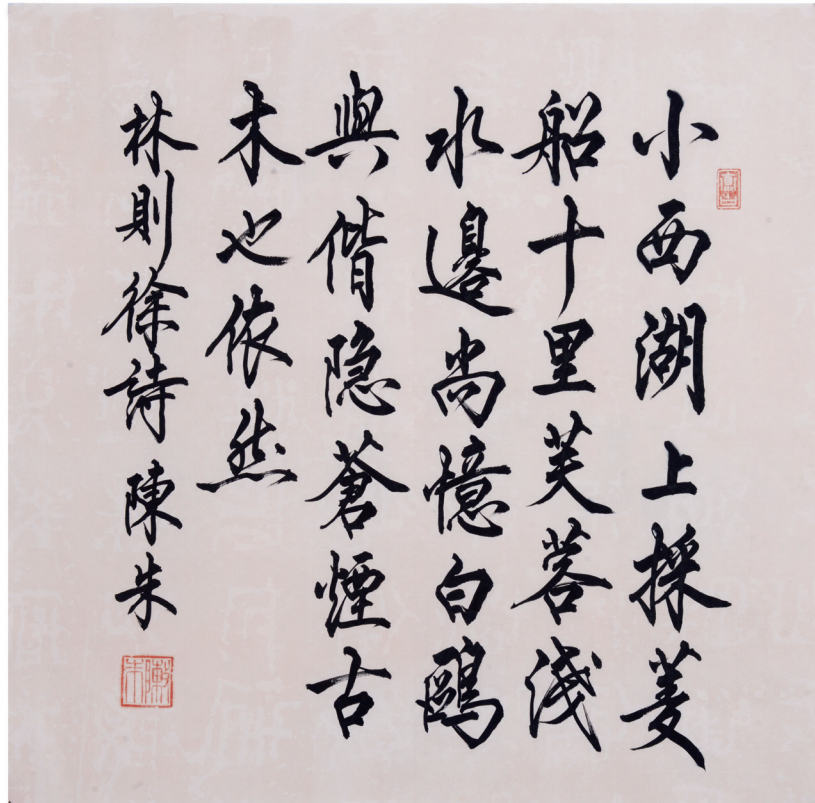
陈朱，笔名丹之，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自幼习书，从唐人楷书入手，长期临习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书家名帖，后又坚持研习“二王”行书，逐渐形成清俊古雅之书风。作品入选多处碑林、石刻，并被多地美术馆、博物馆收藏。钢笔书法作品曾获全国特等奖。出版有《文心荷境——陈朱书法作品集》《陈朱钢笔字》等专著。曾先后担任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巡视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现任中华文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名誉理事、福建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福建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海峡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福建画院特聘画师。



陈朱



对联



斗方行书林则徐诗



扇面屈原《离骚》

龚易图与“大通楼”藏书

王宜春

在清季，龚易图可谓文武双全的传奇人物，一生平乱、治水、赈灾、办厂，功绩不凡。龚易图才华横溢，天资高旷，善书画，喜作诗，还是一位艺术家和近代著名的藏书家。

“藏书岂为儿孙计，有志都教馆阁登。”龚易图藏书目的，是要让更多人都能读到书，这是他有别于其他藏书家的高明之处。

龚易图（1835-1894），字少文，号藹仁（一作人），又号含晶、乌石山房主人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十四日出生在官宦人家，家住南街通贤境巷，自幼熟读诗书。咸丰三年（1853）应闽县试，名列第七。翌年，应福州府试，名列第一。咸丰五年（1855）得中举人，咸丰八年（1858）进士及第，由翰林院庶吉士改云南省任知县。

时捻军兴起，龚易图留在山东，跟随僧格



龚易图在双驂园

林沁作战，攻克金楼等地有功，以知府任用。清同治七年（1868）调补济南知府，同治十年（1871）任登莱青兵备道道员兼东海关监督。

龚易图在任上热心慈善事业，创办兼善堂，为贫民施粥、施衣、施棺木等。清光绪元年

(1875) 清廷下诏筹议海防，龚易图上《海防刍议》8篇。清光绪二年(1876)，英国以传教士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为借口，胁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英、美等13国兵舰停泊在烟台港口，进行威胁。龚易图严守职责，内抚外防，使治安无隙。当年，境内久旱降雨，当地商绅倡建“小蓬莱阁”，龚易图撰写了《小蓬莱阁铭》，记述建阁的缘起。“小蓬莱”石坊横额、阁北山墙外《光绪丙子八月登小蓬莱阁》七律诗4首，均系龚易图题书。清光绪三年十一月(1877年12月)，龚易图任满被召见进京后，请假回乡修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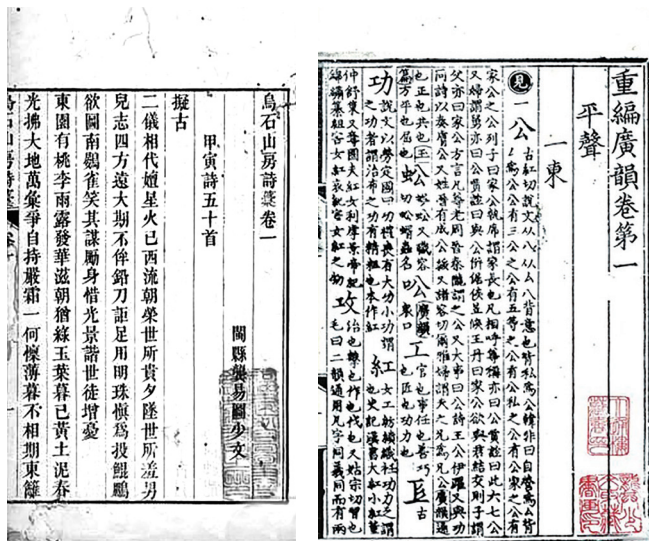
莹，适逢福建大水，慷慨捐赈白银1万两。此后历任江苏按察使，云南、广东、湖南等地布政使。

龚易图天资敏捷，才具文武，不仅战功卓绝，且著述甚丰。他能诗画，喜藏书，是晚清福州最著名的藏书家之一，所建大通楼是福州乃至福建藏书最多、建筑面积最大的藏书楼。他喜山水，在福州修建了4座著名的园林别墅，即半野轩、环碧轩、武陵别墅和双骏园，也为闽省第一，创下了福州园林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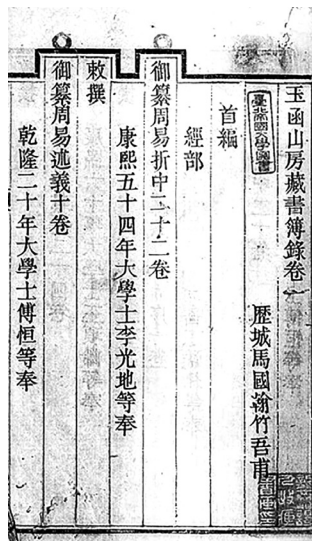
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龚易图回故乡福州。他在家乡广筑园林，城里有四处：双骏园



福州西湖宾馆内三山旧馆白洋楼旧址



龚易图著作之《乌石山房诗稿》 龚易图在福建省图书馆藏书



龚易图台湾大学藏书书影



大通楼藏书印

在乌石山西南隅，旧名荔枝园，园内的荔枝特别好；武陵园和芙蓉别岛，均在朱紫坊花园弄，园中怪石嶙峋，为福州之冠；环碧轩在西湖东边（今西湖大酒店）的三山馆，原系龚氏祖居，曾出典他姓，易图赎回后重建，内立龚氏宗祠，植树种花，凿池垒石，水木清幽，他晚年在这里度过。

环碧轩园林之胜甲榕城，他于园中建造大型藏书楼，称之为大通楼，含有大家通用之意，内将先祖藏书及自己苦心搜求的古籍图书分门别类藏放楼中，题额“五万卷藏书榭”。

龚家藏书，屡聚屡散。到了龚易图父亲龚耀孙时，家道式微，图书散失殆尽。龚易图少时家中无多书，只有其高祖龚景翰所留的“手藏数千卷，内史学及兵书，算学为多”。龚易图尽读之。

龚易图从小受先辈藏书读书的熏陶，11岁时即能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选购与收藏图书，见有好书就不惜重金求购，购不到也要借抄。他拥有的善本，多从福州藏书家林轩开、郑杰、何治运、何则贤、刘家镇及浙江海宁藏书家陈鱣处求购而得，仅从海宁陈氏处所购典籍就有3000余种。大通楼藏书多为元明刻本及建阳麻沙本、名家抄校本、未刊稿本等。

藏书楼聘有专人负责管理，并让亲友及邻里子弟好学者上楼阅读抄校。这种有别于密而不宣的一般藏书家做法，实为高明。

“大通楼”藏书计58000千余卷。加上“乌石山房”藏书共计9万余卷，藏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贮54橱。龚家的藏书，在龚易图手中达到顶峰。福州乃至福建书最多、建筑面积最大的藏

书楼当属龚易图所建的“大通楼”。龚易图为自己的藏书楼题联曰：“藏书岂为儿孙计，有志都教馆阁登。”此联说出了建大通楼之本意。光绪三年（1877）腊月捡校藏书，编次既竣，龚易图亲自题诗为识，其一是：“念此他无求可嬉，贫儿骤富便成痴；搬姜无用将怜鼠，还酒从今不借鸥。高阁料应冬日束，名山已悔十年迟；封侯食肉寻常事，得作书痴亦大奇。”

龚易图天资敏捷，为文下笔立就，又精通禅理，擅于诗画。其诗风格近似清代大诗人袁枚、赵翼，书画学苏轼。易图晚年深居简出过着安闲的生活，他性格豪爽好客，家中园林又极幽雅，经常与友人吟诗作对诗酒怡情。他撰一对联：“五岳归来不看山，百年无事但饮酒。”不幸的是他患了风湿病，渐成偏风之症，但还能作画吟诗。

清末，在福州缙绅中，有“二老”最为士人所敬重，一为龚易图，二为陈宝琛，前者人称“龚蒿老”，后者人称“陈弢老”。他俩都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龚易图建的大通楼位于福州北后街，与当时闽侯螺洲的陈宝琛的沧趣楼，一南一北交相辉映，因此在藏书家中有“南陈北龚”之美誉。

光绪五年（1879），龚易图曾自编《大通楼五万卷书楹藏书目录》，1931年经其孙龚礼逸修订后，更名为《大通楼藏书目录》，收集了经、史、子、集各类图书5万余卷，其特点是：每书之下均有题解、作者、卷数册数、版本与流传情况，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1915年，三山旧馆内白洋楼前，龚易图子孙合影

龚易图是晚清福州最著名的藏书家，当时人评价说其藏书之富、之精，在福州乃至闽省堪称第一。据《乌石山房简明书目》《大通楼藏书目录》不完全统计，龚易图的藏书超过16万卷，4万余册，现今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库中藏“大通楼”图书15000余卷、4000余册；台湾大学图书馆藏龚氏“乌石山房”藏书34000余册。

易图于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病逝福州，享年59岁。著有《乌石山房诗存》8卷、《文钞》2卷。1941年，日寇占领福州，将大通楼藏书许多珍本抢走。新中国成立后，其孙子龚钺把书和文物都捐给政府，分藏于福建省图书馆和福建博物院。作为书香门第的龚家，虽然历代为官，却并不招摇。而且这个靠俸禄维持的家族一度远离官场，平淡度日，以至于百年过后，被人记住的只有龚易图和大通楼藏书。

大宋天空下的并蒂莲

沉 洲

一、历史断章

时空倒转，900多年前的一天，朝堂上的大宋皇帝看到一份奏章，那是中枢部门的官员范祖禹呈递上来的。奏章里说：有一位叫陈祥道的官员，因其父犯事受到牵连，长期赋闲在家。此人发愤20年，深研详考上古礼学，现在已经撰写成150卷的著作《礼书》。该书用功精深，颇究先王之蕴。全书卷帙浩繁，并附有示图数百。陈祥道家境贫寒，短期内无力缮写完备以进献朝廷。还请圣上仁爱为怀，特事特办，酌情拨给笔墨纸张，再差遣宫内书匠画工，协助其抄录誊清，尽早奉呈圣上御览，定有可取之处。

这是北宋哲宗元祐年间上演的一幕，事情大约发生在公元1089年。

无独有偶，如此历史场景有了一次惊人的重复。《宋史》记载，距上述事件12年后的某一天，

那时宋徽宗即位不久，礼部侍郎赵挺之也上了一份奏章，言及太学博士陈旸著述了《乐书》共200卷，该书内容通达连贯，明了完整。请圣上依据其兄陈祥道于前朝进献《礼书》时的旧例，派人帮他完成抄录并上呈朝廷。

著作一礼一乐，著者一兄一弟，同样因为书籍内容精道、撰写者家境贫寒，12年间，北宋的两任皇帝皆依大臣之奏批复办理。事情的结果便是当时闽清县二都宣政里漈上（今闽清县云龙乡际上村）名叫陈祥道和陈旸的兄弟两人先后受到皇帝褒奖，随之而来的是官职升迁，给后人留下“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的佳话。

二陈兄弟的《礼书》和《乐书》两部鸿篇巨著，无疑是当时中国礼乐文化的最高成就。清乾隆年间，堪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总汇的《四库全书》同时将两部著作收入列为经部。2008年，国家文化部组织专家反复审议、遴选、论

证，从先秦以来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确定了 2383 部为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礼书》《乐书》也位列其中，升格为国家保护的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

还有，在被尊为帝王祭坛的北京天坛公园神乐署显佑殿，尊奉着 8 位中国古代音乐先贤的塑像，陈旸跻身其间。今天的专家们对《乐书》一致的评价是：它对宋代以及宋代以前历史的音乐面貌做了十分罕见的包罗万象的记录和考证，是一部经过整理的史诗式的音乐百科著作，称其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没有丝毫的过誉。况且，它还比西方第一部音乐百科、德国的《音乐词典》早诞生了 600 多年。

侥幸留存于世的古籍史书中，散落在故纸堆里的那一些断章，勉强还能拼接还原出近千年前依稀的历史场景，让今人感喟良多。在敞开科考之门、广储天下儒士的宋朝，二陈兄弟都是通过科举进士、由一介布衣进入宦途的；兄弟俩同在朝廷为官，家道不宽裕，居然窘迫到添置不起誊写书稿的纸笔；大宋皇帝个个满腔的文人情怀，不是学者也是文艺高人，若非货真价实的好东西难入他们的法眼。

二、大宋气象

北宋遭契丹族入侵，似乎就只剩杨家将一门竭力抗辽；南宋受女真族攻打，似乎也仅留下抗金将领岳飞被冤杀的故事。当下的影视、艺术作

品中，面对外侮时的宋朝总是屡战屡败，割地赔银子，留给人的印象除了惨败就是屈辱；朝廷内部却党争不断、奸佞横行，让后人怒其不争。

然而，这管窥一斑终究不是全部。一幅《清明上河图》流传了近千年，画面上楼房屋舍鳞次栉比，街巷人流摩肩接踵，那一派繁华昌盛的景象让世人惊叹不已。史料上说，当时都城汴京人口已达 100 多万，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张择端，这位北宋画师和二陈兄弟生活于同一个时代。

为了避免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宋朝建国伊始便采取了重内轻外的施政国策，强化中央集权，与此相匹配，兵力部署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历史上的这个时期，恰逢西北地域的游牧民族群雄四起，这就是立世 320 年的宋朝始终外患不断的内外因素。

不可否认的是，宋朝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儒学复兴，尊师重教之风气盛行，政治也比较开明廉洁。开国大约 40 年后，在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期开始步入盛世，紧随其后的二陈兄弟也踩上了那个时代的节拍。

专家考证，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空前绝后，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财政收入居历朝之冠；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仅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便是在两宋时期发明和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



《礼书》

大宋的天空星光灿烂，大师辈出。柳永、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沈括、程颢、程颐、苏轼、米芾、李清照、陆游、朱熹、辛弃疾……就连一国之君的赵佶好像都忘了帝王霸业，忘记了天下，陶醉于“瘦金体”日渐独步书坛的自得，还写下了让今人津津乐道的《大观茶论》……

这一切，便是《礼书》《乐书》萌芽生根、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和气候，就波澜壮阔的大宋文化而言，它们仅仅是其中的两朵小浪花。

只是在冷兵器时代，骁勇好战的游牧民族掌握着战场主动。西党项、北契丹、东女真虎视眈眈，紧紧环围着北宋。长期以来冗兵、冗官造成的冗费，拖垮了宋朝的财政，在军事积弱之后，国力也开始积贫，与辽、西夏、金的战争接连失

利，最终在蒙古铁骑的横扫之下灰飞烟灭。

所幸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仅是王朝的更替，而文化却彼此叠加、包容，在丰富多彩之后，源远流长地向今天走来。

三、礼乐并蒂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乐从来就是同胎一体的，“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使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它是

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围绕着“礼”，以此疏导、统一人们的思想感情。以礼修身，以乐治心，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陈祥道青年时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注意收集并潜心研究历代礼乐制度，通晓历代礼制沿革和典故，他23岁进士中举后，便开始穷经著书，发愤20年，修成150卷的《礼书》。该书阐述了上古夏商周三代礼制，介绍了当时上层社会礼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譬如王和诸侯城郭制，王、诸侯、大夫和士寝庙制，朝觐之礼，诸侯朝天子送迎之节，诸侯贡享之礼，冠礼，婚礼，丧礼和丧期，各种祭祀之礼，卜筮之礼，射礼，衅礼，族燕之礼，视学养老之礼，养孤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以及这些仪礼中不同身份等级的音乐、服饰、仪仗、礼器和祭品的

运用。书中附有示图 781 幅，先图后文，根据前人著述引用儒家经典对礼仪进行考证、校订和补充，纠偏补缺，条理分明，内容完备。陈祥道诠释儒家经典深受老师王安石的影响，不沿袭前代儒士的说法，自创新义并多有独到之处。

《礼书》进献朝廷后，当朝重臣范祖禹评价道：“用意专精，求之诸儒，未见其比。”陈祥道的《礼书》与北宋司马光的《书仪》、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对后世学者研讨礼学发展、了解上古时代礼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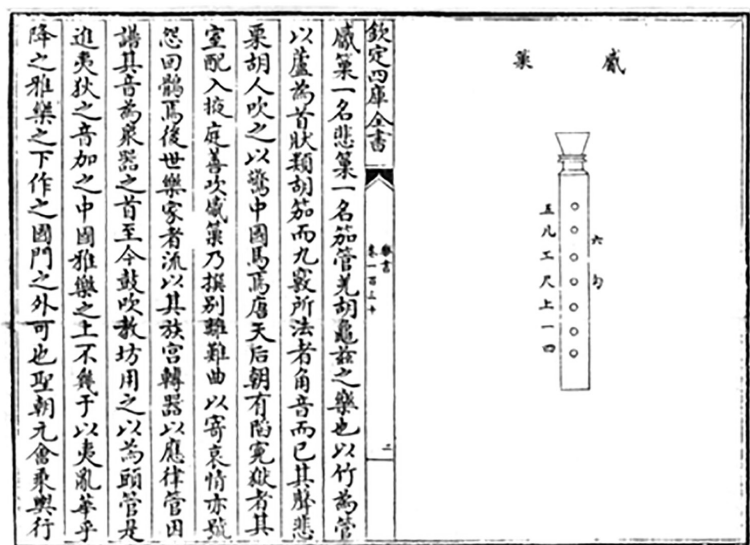
陈祥道认为：“礼乐者，治道之急务，帝王之极功，阙一不可也。”但终因精力有限，无法全盘铺开，便鼓励其弟陈旸去完成自己未竟的心愿。

与陈祥道同父异母的陈旸小哥哥 24 岁，自幼精通音律，熟悉儒家经典，于 27 岁中举“贤良科”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他铭记兄长教诲，不仅接手一些资料，还借鉴了《礼书》的编纂体例，充分发挥自身强记博学的特长，前后用了 16 年时间，著成《乐书》200 卷。此书前 95 卷为“训义”，摘录《礼记》《周礼》《仪礼》《诗经》《尚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等经典书籍中有关音乐的文字，逐一加以解释，阐述儒家的音乐思想。后 105 卷为“乐图论”，

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内容包括乐律理论、乐器、声乐、舞蹈、杂技、百戏以及多种典礼音乐的介绍，包罗万象，在记录和考证宋代及宋代以前宫廷雅乐的同时，对民间音乐、外来音乐和乐器也广事收罗，同时配有乐器和舞蹈示图 540 幅。该书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古代音乐史料，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

《乐书》在南宋庆元六年（1200）刻行于世，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其《序》中盛赞道：“盖远自唐虞三代，近逮汉唐本朝；上自六经，下逮子史百氏；内自王制，外逮戎索；网罗放失，贯综烦悉……使人味其论，玩其图，忽乎先王金钟天球之音，锵如于左右也……”

那个大时代毕竟尾随着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儒士情怀浓郁地弥漫于社会。献书于朝廷，二陈兄弟并非



《乐书》插图笙

只是期望以此来博高个人身价，进而加官晋爵，而是梦想通过礼乐来维护尊卑有序的君臣纲纪，达到治国的目的。如果说王安石被罢相之前，陈祥道的学识还在社会变法中小试了一下锋芒，那么，陈旸锻造了十几年的宝剑却始终尘封于剑鞘，《乐书》被“储之秘阁，久而未彰”。46岁那年，他又因“言盐铁利”之事得罪宋徽宗，被罢官放逐。那个非常的年代，朝廷党争激烈，政局变动频繁，满腔报国热血的二陈兄弟先后心灰意冷，复官后均选择了告老还乡。

《四库全书》总纂纪昀这样评价《乐书》：“……引据浩博，辩论亦极精审。视其兄祥道《礼书》，殆相伯仲。”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岂止是著书的方式和内容，便是人生的志向和道路，兄弟俩亦走得几乎不约而同。

四、后世影响

儒家构建的礼乐体系，“礼”占主导，是终极目的，“乐”只是“礼”的一种形态。况且，作为王安石的学生，陈祥道另一部也入编《四库全书》的《论语全解》10卷，就是变法中的“新学”，成为北宋哲宗时期流行的科举用书，影响颇大。他虽居散官闲职，但渊博学识得到皇帝赏识，晚年被“赐绯衣”，以从八品的官职享受六品官员的待遇。去世后又钦赐御葬，一时名声鹊起。《宋史》中记载了他“贵人贱马”的谏言，时至今日，仍闪烁着人本思想的光辉。然而，随着

时代变迁，《乐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日渐为后代所认识，陈旸的影响面超越其兄。数百年来，闽清的坊间乡村流传着许多关于陈旸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这些，应该也和陈旸不顾个人得失、为民请命的人格有关，他坚持真理，与皇帝“辩宝”而受屈失职。该县县志里记载的陈旸获赦复职、辞宦还乡后为桑梓百姓修筑“贤良陂”的故事，依旧延续了一位体恤民生、积善积德于民的儒士形象。数百年来，他活在家乡父老心中。

进入现代社会，治国之本的“礼”已经失去了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土壤，缩水为礼仪道德的内容；而“乐”则从曲高和寡的宫廷雅乐发展成为纯粹的音乐艺术门类，它通过节奏和旋律来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现实生活，滋润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现代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还有，音乐和乐器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形成一种产业，《乐书》里的民间音乐、外来音乐和乐器的介绍和示图这些罕见的文献资料，能衍生出很好的经济价值，还指导着今人去复兴古音古乐，发扬光大传统文化。

二陈兄弟的事迹历久弥新。在闽清县城，清朝嘉庆年间就修建了“二陈先生祠”；21世纪初又择址重建陈祥道、陈旸纪念堂，整个建筑远观翘角重檐，燕翔龙腾，仿佛一座宫殿楼阁；趋前但见画栋雕梁、牌匾楹联流光溢彩，俨然一处造型典雅的胜景。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闽清县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从《陈晋之读书法》说陈旸

陈诸安

2010年山东省菏泽市中考语文试卷中有这样一道文言文阅读试题：

陈晋之读书法

清·陈善

读书惟在记牢，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后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数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虽一岁未尝百二十字也，况一日乎！予少时实有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虚，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

这则课外阅读材料内容深刻，文字浅显，考试结束后不久便被众多中考“考试宝典”选中，成为众多学校初中语文课外练习题，该短文也成为众多学校要求初中学生诵读的经典材料。

《陈晋之读书法》一文出自陈善《扞虱新话》，试卷命题者将宋代的陈善误为清代人，应予更正。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朱自清等对《扞虱新话》都有过很高的评价。《扞虱新话》考评经史的内容篇章占相当大比例，对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民俗、掌故、佛道等记载评论也不少，提到的宋代人物多为名儒，陈晋之能入其法眼，实在是陈晋之的看重与赞赏。

《陈晋之读书法》系《扞虱新话》卷四“读书类”第三则，原标题为《读书牢记则有进益》，推测此标题是陈益整理时所加，较符合文意，而山东省菏泽市中考命题者则根据试卷需要将标题作了更改。从这则随笔第二句“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句，后遂无书不读”，以及文末“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来看，“陈晋之”系闽清县北宋进

士陈旸确凿无疑。陈旸（1068-1128），字晋之，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进士，故世人称其“陈贤良”。在闽清，“陈贤良与皇帝辩宝”的故事流传了几百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很多人却不知陈贤良名旸，字晋之。

陈旸由贤良科登第，官至礼部侍郎、显谟阁提举醴泉观，写下皇皇巨著《乐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在2008年被国家文化部列为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他被列入中国古代八大音乐名人之一，在北京天坛公园显佑殿神乐署内端坐着他的塑像，供人们瞻仰。陈旸是一位值得闽清人引以为豪的古代杰出人物之一。我们研究历史，就要探讨陈旸取得成就的原因，古为今用。那陈旸成功究竟有何秘诀呢？陈善《读书牢记则有进益》一文则告诉了我们其中一个方面。

读书学习就是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荀子《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一个人只有持之以恒地努力学习，扎扎实实记牢知识，日积月累，才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切忌贪多嚼不烂。陈旸就是这样做了，“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后遂无书不读”，以其博学多才，27岁荣登贤良科进士，33岁著成“中国文艺学术史上的一部划时代专科巨著”——《乐书》200卷。

就阅读方式而言，阅读有精读与泛读之分。精读就是逐字逐句地把文章读透，深刻理解文章

的内容，并记牢。泛读则是浏览性阅读，也称通读，就是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一遍，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略去，继续往下读，以了解文章的大意。精读求其深与专，泛读求其博与广。大凡做学问，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但二者必须很好地结合才能达到目的。陈旸由精读入手，不求其多，但求记牢，日积月累，博而广之，达到了博学强记的境界。而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说自己是“五更三点待漏，一目十行读书”。这两位大诗人却又是另外一种阅读方式了，但也都成为一代大师。

当今是知识大爆炸的网络时代，文化知识浩如烟海，与900多年前陈旸所生活的时代相比，知识量何止增加千万倍？“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的读书法是否落后于时代呢？我以为并未过时。“陈晋之读书法”的原则是“读书惟在记牢”，并非拘泥于字数上。我们现在所处的商品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人心浮躁，真正能潜下心来读书的人不多。2013年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在北大图书馆做了一场关于读书的讲座，他说：“长于网络的年轻一代，很容易养成浏览性的阅读习惯，就是朱熹说的‘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因此，我主张读少点，读慢点，读精点。”他的见解，与陈旸何其相似啊！你能说“陈晋之读书法”过时了吗？